

山西大学

云冈学研究院通讯

第3期
2021年1月

主　　编：杭　侃
编　　辑：武　夏　卜佳慧　冯鹏锦
出版日期：2021 年 2 月 8 日
地　　址：太原市坞城路 92 号
封面图案：云冈石窟第 19 窟西侧胁侍窟

目录 MAIN CONTENTS

◎研究院动态

云冈研究院正式成立 • 03

山西大学考古系石窟寺专项调查纪实 • 05

◎学术活动

国学、中国文化经典教育、中国文字等交叉学科正式设立 • 09

何莲珍：做好顶层设计，推动人文社科领域交叉研究 • 11

山西三大新展览重磅来袭：汉画像石神话、香文化、牛年生肖文物 • 12

“星龛奕奕翠微边——洛阳龙门石窟魏唐造像艺术展”开展 • 15

山西大学图书馆发布《山西大学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2020 版） • 16

◎云冈学研究

48 年前，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山西煤炭地质人对云冈石窟做了特殊的“体检” • 18

先生们与《敦煌艺术大辞典》□赵声良 • 22

孙机：考古能看得见历史，也能望得见未来□李静 • 27

宁波：云冈石窟数字化 如何应用与存储数据？□李家丽 • 31

近年北魏墓志整理中误收的伪志□刘琴丽 • 35

牙结石揭示南亚与近东的食物贸易□ Ludwig Maximilian 汐莫 译 • 39

目录 MAIN CONTENTS

◎同仁学术

孙贯文先生的金石研究□赵超 • 45

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李裕群、Lidu Yi • 49

北魏金铜佛板图像所反映犍陀罗文化因素的东传□李静杰 • 53

南涅水石刻参观札记□杭侃 • 57

昙曜五窟的营造次序和理念□韦正 • 61

◎书刊推荐

《佛陀相佑》 • 44

《南亚和东南亚的艺术》 • 56

《北朝造像题记书体研究》 • 65

日本云冈石窟研究著作目录（三） • 66

云冈研究院正式成立

2月19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云冈石窟研究保护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一体推进云冈石窟保护和云冈学研究，云冈研究院正式成立。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吕岩松，省委常委、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山西省文物局局长刘润民，省直部门有关负责人，大同市委相关领导，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云冈研究院中层以上干部出席云冈研究院成立大会。大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强主持会议。

会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志刚宣布关于成立云冈研究院及相关任命决定。张焯同志任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杭侃同志任云冈研究院院长。

张焯同志在表态发言中表示，此次任命是组织上对云冈多年工作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我个人的充分信任。作为一名老云冈、老党员，除了对党和政府的深切感激之外，我对云冈石窟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作为云冈研究院的党委书记，第一



责任人，有责任、有义务带领研究院党政班子和全体职工继续努力，迎难而上，奋勇拼搏，再创辉煌。

杭侃同志在表态发言中表示，十分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让我出任云冈研究院院长，我在感到责任和压力的同时，也感到了鞭策和力量。我有信心、也有决心，团结班子成员，带领云冈研究院的全体人员，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尽职尽责，一定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张吉福书记指出，云冈石窟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期间，来到云冈石窟考察，对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工作以及传承历史文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刻认识保护云冈石窟的重要意义，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强与上级部门、相关院校沟通对接，在做好对云冈石窟精细化保护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吕岩松部长在会上首先传达了省委书记楼阳生 2 月 17 日就云冈研究院成立作出的批示，批示中指出，组建云冈研究院，是省委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加强云冈文化遗产研究保护、推动创建云冈学的重大举措。云冈研究院要立足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总体布局，从考古调查、价值阐释、艺术研究和成果普及等方面，对云冈学研究作出全面规划，努力建成云冈学权威研究平台，着力锻造一支业务精湛的科研队伍，全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研究成果，推动云冈学走向世界。接着，吕岩松部长表示，云冈研究院成立是我省宣传文化系统发展的一件大事，是云冈石窟事业的一个里程碑。希望云冈人牢记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殷殷嘱托，以最严格的政策和措施保护好研究好世界遗产云冈石窟，以最坚决的意志和行动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谱写云冈事业新篇章，让云冈事业在新时代追赶超越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云冈研究院这一公共文化研究机构承担着云冈石窟保护、监测、研究、展示，统筹云冈学建设发展和区域性石窟保护的职责。研究院下设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考古研究所、数字化保护中心、文献资料中心、文旅融合发展中心等 10 个内设机构。今后，云冈研究院将坚持保护第一、统筹做好云冈石窟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深化学术研究、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云冈学研究高地，推动文旅融合、打好“游山西就是读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牌，为走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石窟寺保护利用之路创造山西经验。

（据微信公众号“云冈石窟官微”）

山西大学考古系石窟寺专项调查纪实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研究加强石窟寺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2020 年 11 月 13 日，山西省文物局组织启动了山西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对全省 1911 年以前开凿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不可移动文物展开调查研究。

本次调查重点为宋代以前的石窟寺，包括对已发现的石窟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对新发现的石窟寺进行登记测绘。调查由四支队伍共同实施：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负责临汾、晋城；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负责阳泉、晋中；云冈石窟研究院负责大同、朔州、忻州、吕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负责长治、运城、太原。

虽然春节临近，四支队伍的专项调查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他们是如何在野外工作的？取得了哪些成果？调查中有哪些感受和心得？从今天起，我们分别走近四支队伍，看他们是如何做这次石窟寺专项调查的。

今天，首期与大家见面的，是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调查组。

兵分三路 各自为“战”

石窟寺作为我省的特色文物资源，一直存在着调查与研究不足、后备力量薄弱的问题，而近期开展的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途径。

长治石窟调查组由山西大学考古系武夏老师带队，队员有研究生马楠、李辉、景晓敏，本科生冯鹏锦。调查组以县为单位，依河流走向而行进，对各地石窟及摩崖造像展开实地调查。截至 2021 年 1 月 23 日，除与河北交界处的两个地点外，近 80 处石窟及摩崖造像的田野调查已经结束，调查报告已完成武乡和沁县两地，其他各地的调查资料还在紧张整理中。

运城石窟调查组分两队，一队由山西大学考古系张亮老师带队，队员有研究生秦雪松、曹嘉欣、谢钰、赵鑫。由于各石窟点分布比较分散，调查组以县为单位从北到南依次进行。受运城地区疫情影响，调研进行到一半无法继续进行。截止到 2021 年 1 月 23 日，调查组共完成六处地点的调查，其中复查三处，新发现两处，核销一处石刻，报告整理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另一队由山西大学考古系刘辉老师带

队，队员有研究生焦继刚、白晓妍、赵宜敬。调查组主要调查对象为运城市的夏县、平陆、永济三个区域内的石窟造像。截止到 2021 年 1 月 20 日，三个区域内的田野实地调查已经结束，相关的调查资料还在积极有序的整理中。

太原石窟调查组由郝军军老师带队，队员有研究生高鹏飞、卜佳慧，目前该队伍还在进行野外调查。

新的发现 新的收获

长治组本次调查更正和充实了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如武乡县石窑会石窟，在三普对于该石窟的记录中，只登记了 1 个摩崖龛，而此次调查发现了一处中型石窟和洞窟外立面的 7 个龛；又如沁县东仁石窟，在三普调查中登记了两个石窟，而这次调查还新发现了第三个石窟。除了增补三普数据外，本次调查新发现两处造像，分别是武乡县娲皇庙摩崖造像和长治县法兴寺摩崖造像。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如果有其必要，调查组也会对石窟开展清理与发掘。在对于沁源程壁石窟的调查中，长治调查组联合当地乡镇对其中的部分石窟进行了清理，发现此处造像雕刻精美，保存状况较好，师生当即呼吁当地政府保护管理。

运城组本次调查在三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所调查的石窟和摩崖造像的保存现状的更新，同时增补了一些新的发现。比如张家庄摩崖造像由于原来所处环境不好，现已搬迁易地，因此相关的数据需要马上进行更新；再如在对禹门口摩崖造像进行调研的过程中，于其斜对面的山崖上还发现了一处规模不大的石窟，队员们随即对其进行了清理和测绘。

翻山越岭 历经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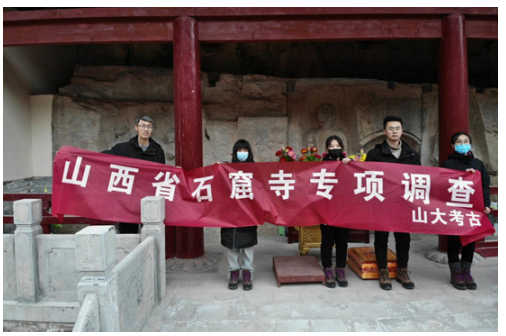
长治地区共分布有中小石窟、摩崖龛、摩崖造像 80 余处，对其中的每处文物点，



调查组在程壁石窟附近与当地村领导合影



调查组在运城新绛县张家庄造像前合影



调查组在运城夏县张果老洞造像前合影

队员都进行了细致的传统测绘和数字测绘，并给每处石窟和摩崖龛像都建有三维模型，尽可能保存最详尽的原始资料。

由于较多石窟地处偏远，人迹罕至，清理工作往往十分繁重，队员需携带铁锹、手铲、梯子、扫帚等工具翻山越岭，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初入长治调查，地形奇险，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数平顺县与沁源县。由于地形险要，绕路耽误时间较多，调查组不得不把距离相近的石窟点全部测绘完毕，再踏上返程。在这种情况下，队员们经常举着灯光拍照、绘图。也会遇到山路极其险峻的石窟，进入深山后，手机接收不到信号，只能通过查看地图和询问当地老百姓来寻找石窟和摩崖造像。



调查组释读社科摩崖造像题记

每次为找石窟，爬上山巅，队员们都克服着恐高，挑战着自己。比如在调查开凿于陡峭的山体之上的王凤石窟时，队员们发现窟前原有台地完全塌落，只得手攀草根，脚踏碎石，在山脊上匍匐行进。

运城组调查的第一站是新绛县。张家庄摩崖造像已于去年保护迁移到新址，队员们一路比照资料信息，一路观察地图，终于找到造像新迁移的位置，于是冒着寒风，激动地完成了该地点的信息采集工作。万荣县的调查之旅同样令人难忘，孤峰山摩崖造像位于海拔 1300 多米的孤峰山之巅，去往造像所在地的道路非常陡峭，最终，队员们在刺骨的寒风中登上了山顶。测绘工作结束后，队员们在返回的途中还参观了寺庙，聆听了寺庙住持师父讲经。

收获颇丰 感动尤多

本次山西省石窟寺调查工作意义重大，



与众不同的爬山之旅



调查组扛着梯子努力爬山

不仅可以为我省石窟寺的保护、研究与利用打下扎实的基础，而且可以培养出一批从事石窟寺考古的专业人才。

作为高校，更是肩负人才培养的任务。本次石窟寺调查项目，无论是石窟调查前期阅读古籍文献了解石窟历史沿革情况，还是后期投入野外调查，对石窟现场测绘、病害观察、地质学习，再到室内整理阶段的线图绘制、报告编写，每一环节都给予了学生锻炼机会，让学生们踏上田野，在实践中感受和学习佛教考古。

石窟调查并不只有紧张忙碌，也有调查之余感受到的风土人情。冗长的盘山公路深处总会遇到许多世外之景——在青山古刹感受圣寿寺的古韵，在沁源丹雀小镇体验小桥流水家，在凤凰山遥望朝阳升起，在孤峰山长瞰落日余晖，都使队员们的身心得到了洗涤。

历时两个月的野外调查落下帷幕，此次调查，收获颇丰，不仅为全国石窟寺的调查工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更为下一步的保护、研究、规划、利用工作提供一份可靠、详实的材料。调查中，也有很多遗憾，由于疫情影响，长治组、运城组有几处石窟点未能进行测绘；有几处摩崖造像由于开山修路而荡然无存；更有石窟或摩崖造像头部均已凿毁或风化。这些遗憾，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也更加认识到身为文物工作者的我们，在未来所需承担起的重要责任。

（据山西省文物局公众号“山西文物”山西大学考古系景晓敏、冯鹏锦、秦雪松供稿）

国学、中国文化经典教育、中国文字等交叉学科正式设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当前位置：首页 > 公开

信息名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
信息索引：360A22-07-2020-0016-1 生成日期：2020-12-30 发文机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发文字号：学位〔2020〕30号 信息类别：高等教育
内容概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

学位〔2020〕30号

1 月 13 日，教育部网站正式公布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等的通知》。我国原有的 13 大学科门类正式升级为 14 大学科门类，分别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新增）。

国学、中国文化经典教育、中国文字、书法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古典学、中国学等交叉学科的大量设立彰显了我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需求。

据教育部发布的《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完成交叉学科备案的高校共有 160 所，交叉学科共计 549 个。以下是部分交叉学科名单。

北京大学

交叉学科名称：中国学
所涉及一级学科分类：哲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人民大学

交叉学科名称：国学
所涉及一级学科分类：哲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

交叉学科名称：国学
所涉及一级学科分类：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

首都师范大学

交叉学科名称：中国文化经典教育
所涉及一级学科分类：语言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

四川大学

交叉学科名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所涉及一级学科分类：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

西南大学

交叉学科名称 ：中国文字与书画艺术
所涉及一级学科分类：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
交叉学科名称 ：古典学
所涉及一级学科分类：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中国史

济南大学

交叉学科名称 ：书法学
所涉及一级学科分类：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工商管理

（据微信公众号“诵读人”）

何莲珍：做好顶层设计，推动人文社科领域交叉研究

浙江大学立足文理综合、学科齐全的特点，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坚持文理交融理念、前瞻布局交叉领域、支持学科交叉研究、激励学术创新发展，着力推进学校文科研究范式转型和学科交叉会聚融合。

一、出台总体规划和政策制度

学校在“十三五”规划、“‘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和历次文科大会文件中，均围绕跨学科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或指导性意见。2008年首次文科大会即强调“学科综合交叉”。2016年发布《浙江大学“十三五”发展规划》，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体制机制等层面作出了跨学科相关的重要部署，在评价体系方面提出“完善教师校内兼聘办法，优化教师跨学科的学术评价和成果共享机制”等举措；2018年第四次文科大会进一步强调“推进学科会聚”，并在评价体系方面提出“完善和落实双聘制，促进学科会聚和多学科协同育人，完善校内跨学科的学术评价、成果互认与共享机制。”

二、设立交叉科研项目

学校自2016年开始设立学科交叉预研专项项目，面向全校老师公开招标。选题要求涉及两个及以上一级学科且至少有一个文科学科，鼓励文理学科大交叉项目的申报。

2018年9月，学校推出“面向2030的学科会聚研究计划”，旨在充分利用学科综合优势打造交叉研究创新高地，促进学科会聚造峰和跨领域融合创新，面向未来培育一批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和优势学科。目前已正式发布9个计划，文科牵头或参与的计划有“亚洲文明计划”“双脑计划”和“生态文明计划”。

三、建设创新交叉团队

学校高度重视交叉研究团队建设。在人文社科相关领域，支持建设了一批“大数据+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和“双脑计划”交叉创新团队，积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神经与脑科学与人文社科的交叉融合。创新团队建设已初见成效，在高水平成果产出、重大项目申报、交叉博士生培养、数据库平台搭建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与成绩，在数字人文、互联网法律、语言规律与认知、逻辑认知与人工智能、脑与决策、数据分析与管理创新等交叉领

域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与影响力。

四、搭建交叉研究平台

学校在人文社科领域重点建设了若干校级交叉研究平台，如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神经管理实验室、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为交叉研究搭建平台。

五、培养交叉学科人才

学校于 2017 年试点建设了“文科 +X”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致力于培养复合型高层次文科创新人才。中心招生方向主要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神经与脑科学等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兴学科领域，至今已招收三批共 21 名交叉培养博士生，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哲学、语言学、法学、艺术学等人文社科学科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医学、材料科学等理工学科的交叉领域。

上述举措有力推动了学校人文社科交叉研究，营造了良好的交叉研究氛围，但也遇到一些问题，如交叉学术组织建设有待加强、交叉研究体制机制尚未理顺、交叉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瓶颈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着力破解。

（据微信公众号“语言战略研究”）

山西三大新展览重磅来袭：汉画像石神话、香文化、牛年生肖文物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展览。

春节即将来临，山西省内博物馆都有哪些新展览？本期为大家推荐的是三个正在或即将开始的展览，非常值得一看。

石上少广
——汉画像石神话传说专题展

展览时间：2021 年 1 月 29 日—3 月 29 日

展览地点：晋城博物馆一楼东展厅

主办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晋城博物馆）。

展览内容：

此次展览主题为“石上少广”。

少广（神话传说中的岩穴名），一说山名。《庄子·大宗师》中记



载:“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至高无上的女神，俗称“王母娘娘”，因其所居住的地方“昆仑丘”在汉代都城的西边，故称“西王母”。据称“昆仑丘”即现在阳城县祁城山一带，少广不仅是西王母的居所，更是人类始祖伏羲的王部，是万祖之山，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多与此山或由此山衍生的其他故事有关。

作品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将汉代以伏羲女娲、西王母等神祇为主的神话传说以及由主神演变的附属故事做一展示，借此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

让我们一起走近汉画像石，徜徉千年忘川。

香魂——中国古代香文化展

展览时间：2021 年 2 月 4 日—2021 年 5 月 9 日

展览地点：山西博物院主馆一层临展厅

主办单位：山西博物院

协办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九龙沉香博物馆

展览内容：

香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独具魅力的表达方式。



草木芳香间是人与神的奇妙感应，蜿蜒的丝路上藏着对文化的嗅觉感知，瑞器中流淌的香雾有着畅怀舒啸的生活态度。在不绝如缕的氤氲中，飘散着古人的心灵意趣。

香魂雅事皆有情，在小年即将到来之际，山西博物院特推出“香魂——中国古代香文化展”，联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九龙沉香博物馆，精选 160 余件 / 套与香文化有关的藏品和艺术品，多维度展示意趣美妙的香文化，邀您来感受这份馥郁的开年“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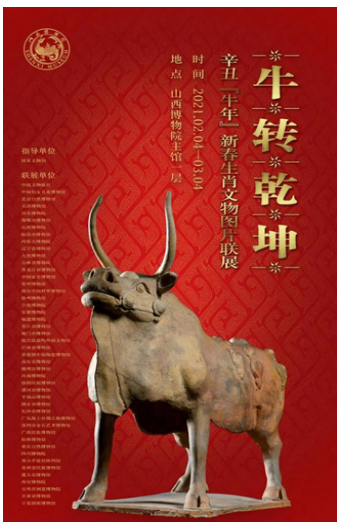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传承有序。先民最初焚燃香草的习俗与祭祀有关，在众多遗址中、遗物中留下了痕迹。汉代丝路畅通，树脂类香料开始传入中原；同时，原产于东方的麝香源源不断地向域外输出，香料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在香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上自朝堂，下至市井，皆习香事。上古燔燎祭祀，先秦绮兰佩香，汉魏中西合香，各类香料广泛应用、各式香器应运而生，各种情感赋予其中。隋唐的富贵奢华、宋元的清远素净、明清的千姿百态，香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意义越来越宏阔。从神秘高远的祭祀，到奢侈华贵的庙堂；从清雅馨香的书房，到大众百姓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东方香魂独具神韵，魅力无穷。

牛转乾坤——辛丑（牛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

展览时间：2021.02.04—03.04

展览地点：山西博物院主馆一层



联展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文物报社、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邯郸市博物馆、山西博物院、临汾市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大连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黑龙江省博物馆、中国证券博物馆、常州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宁波博物院、安徽博物院、福建博物院、晋江市博物馆、厦门市博物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高安市博物馆、赣州市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洛阳民俗博物馆、漯河市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桂林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四川博物院、邓小平故居陈列馆、贵州省民族博物馆、遵义市博物馆、西安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

展览内容：

在牛年新春到来之际，中国文物报社联袂 40 余家文博机构，共同策划的“牛转乾坤——辛丑（牛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即将推出，众筹数百幅牛主题文物艺术品图片，于多地同步奉展给公众，期盼展览中耕地播种、载拉运送，雄壮威猛、憨态可掬的牛儿们，让您追忆起往昔岁月、乡土乡愁的那份美好，并在纳福迎祥的佳节喜庆中汲取勤奋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

2021 年是农历辛丑年，也是十二生肖轮流值岁中的牛年。牛，作为生物学上的牛科大型哺乳类动物，种类多，分布广，因身形庞大有力气，习性温顺易驯服，而成为人类驯养最早的家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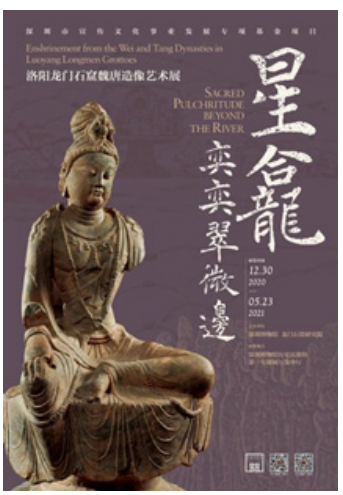
植根于我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丰厚沃土，牛与中华先民结缘深厚，历代社会生活、信仰崇拜、文学艺术中不乏牛的身影和故事。

展览共分为四个部分：“生肖故事”揭示了生肖文化的源与流；“牛族本纪”则展示了自然界中种类丰富的牛；“五牛迎春”中将通过春牛耕春、神牛通灵、吉牛纳福、牧牛意趣、铜牛镇水来讲述意蕴深厚的牛文化；“牛年话牛”中将民俗传说和工艺美术中的牛元素用绘画、剪纸、雕塑、民间工艺品等图片形式展示出来，带您进入一个牛气冲天的活力世界！

（节选自微信公众号“文博山西”）

“星龕奕奕翠微边——洛阳龙门石窟魏唐造像艺术展”开展

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深圳博物馆历史民俗馆第一专题展厅，由龙门石窟研究院与深圳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星龕奕奕翠微边——洛阳龙门石窟魏唐造像艺术展”与公众正式见面，展期将持续至 2021 年 5 月 23 日。



这次展览筹备已久，为庆祝深圳特区建立 40 周年和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 周年的盛事，踏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等重要指示，加强区域间文化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龙门石窟研究院与深圳博物馆共同谋划、深挖内涵、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力为公众奉上一份精神文化盛宴。

史家珍表示，深圳博物馆是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为一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是世界各地观众品味岭南文化、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龙门石窟的精品文物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荟萃之地来到现代高科技产业的汇聚之所，穿越时空与公众交流，对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传播丝路文化和黄河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叶扬讲到，此次展览是深圳博物馆整合国内资源，在年末精心为公众奉上的一个重磅大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龙门石窟用了“三个最”的评价，即“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充分展现出龙门石窟在国内外石窟寺中的重要地位。这次展出的文物种类丰富、精品云集，无论是从价值还是体量层面考量，都是极其难得的珍品，希望公众们能通过展览领略到中国顶尖的石刻艺术。

此次展览共分为“孝文革新——北魏龙门石窟的开凿与艺术”“东都政治——唐皇室与龙门石窟造像的鼎盛”“文物归来——海外流失龙门造像的回归”三个部分，汇集了龙门石窟研究院院藏的 76 件龙门石窟相关藏品，其中一级文物 15 件、二

级文物 23 件，珍贵文物占比非常高。通过高树龛主尊佛首、舒相坐菩萨像、力士像、僧怀则幢塔等魏唐造像艺术中的精品文物，同时结合古阳洞原真 3D 打印窟龛、龙门石窟全景漫游等，较为全面地描绘出龙门石窟魏唐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基本面貌和风格特征。

展厅中，文物布局巧妙：部分文物按照洞窟内佛教造像的形制进行组合，呈现“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一佛二胁侍菩萨”等布局；部分被陈列在成排的龛形中，星光熠熠，巧妙再现了山间崖壁中“星龛奕奕翠微边”的意境。建筑仿古，灯光暖黄，佛像庄严，营造出宁静安详的氛围。数件超大体量、超重量级的佛坐像，更是镇馆之宝，其宝相庄严、气势恢宏，令人顿生平和敬畏之心。

龙门石窟大规模开凿始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经北魏隋唐及此后历代的营造，两岸崖壁上的窟龛星罗棋布，南北绵延长达 1 公里。龙门石窟现存编号窟龛 2345 座、造像 11 万余尊、碑刻题记 2800 余品。是唯一一处跨越北魏和盛唐两个中国古代造像高峰期的皇家石窟，以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题材之多样、雕刻之精美、蕴含之深厚而蜚声中外，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展览将持续至 2021 年 5 月 23 日，公众朋友们可通过“深圳博物馆”官网、官方公众号预约参观。

（据微信公众号“中国石窟寺”）

山西大学图书馆发布《山西大学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2020 版）

继 2019 年底推出《山西大学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2019 版）并受到相关学科的欢迎与反馈之后，2020 年，图书馆继续完成包含 10 个学科的《山西大学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2020 版），为山西大学的学科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服务。

《山西大学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2020 版，以下简称“2020 版”）是根据我校学科建设的重点工作布局，在 2019 版的反馈，以及学科办和相关院系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学科发展实际情况和个性化需求，改进完善而成的。相较 2019 版，2020 版在学科范围、数据源、分析方法等方面均有所变化，不仅更新了 2019 版的物理、哲学、计算机、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5 个学科的数据，还新增了数学、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法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5 个学科近 5 年的数据。图书馆充分利用专业化的知识技能，科学的文献搜集、动态跟踪、情报分析、数据分析等文献计量学方

法，在对数据进行大量规范化整理清洗的基础上，分别从科研成果表现、科研基础实力、创新能力、国际影响力、院系贡献度等五个角度分析和展示了山西大学相关学科的竞争力。

2020 版在教育部“破五唯”的精神指导下，积极探索、设计合理的学科竞争力分析指标体系，其主要特色为：①数据来源多元化，在 Web of Science 之外，还运用了 Scopus、中国知网等其他商业化数据源，采集了各类公开数据；②对标机构的选择具有前瞻性，包括北京大学等一流大学，以及不同学科的专属对标机构；③学科映射符合山西大学学科特点；④数据分析和指标体系力求全面，以期更科学、准确地呈现学科发展现状和竞争力，为我校的学科建设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本报告撰写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附：相关研究背景介绍：

学科竞争力是指本学科发展所具有的能力与潜力，是同一学科在不同学校之间的比较优势或差距表现。这种能力与潜力包括很多因素，如学科培养人才与科研成果、学科带头人、学科梯队、资金与设备投入、学科发展方向、相关学科支撑条件、学科建设与发展环境等，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关联系。山西大学图书馆的学科竞争力服务，是在山西大学“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诞生的，是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产生，以科研成果为基础，兼顾科研表现、科研团队、科研实力、创新力、影响力等各方面，其目标是帮助相关学科梳理发展现状、对标国内外相关机构发现学科的长项短板、分析学科竞争力，是学科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据微信公众号“山西大学图书馆”）



48年前，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山西煤炭地质人对云冈石窟做了特殊的“体检”

1月19日，文博山西发布了一篇文章：云冈曾经有个木鼻子大佛，记录了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三年修复包括第18窟在内的云冈石窟的往事，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关注和评论。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的山西煤炭地质人，在云冈“三年修复”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想给云冈石窟“治病”，得先“体检”，找到症结所在才好对症下药。担此重任的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前身——山西省煤炭化工局地质处，采用地质地震物探综合调查的方法，开始了这次特殊的“体检”。石窟与煤炭地质完全不同，进行“体检”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但凭着吃苦耐劳、奋斗奉献的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山西煤炭地质人成功完成了这个项目，为保护云冈石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期，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珍贵的历史。

缘 起

故事的起点是1973年9月，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访华。其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下他专程前往大同，参观云冈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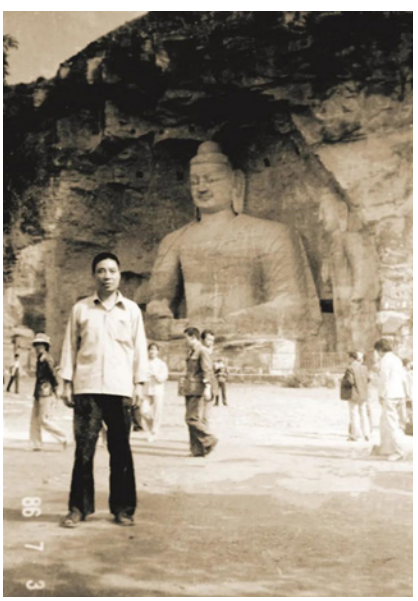


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云冈石窟

周总理陪同蓬皮杜参观了以第二十窟、七窟与五窟为主的这些北魏艺术宝库。巍峨的造像、神秘的微笑，震撼了所有人。在第五窟，蓬皮杜瞻仰着 17 米高的摩天大佛由衷赞叹：“整个云冈和他一样，是世界艺术的一座高峰。”

不仅是蓬皮杜，周总理也是首次直面这些历经数千年风霜的珍贵历史遗存。参观过程中，周总理对云冈石窟日益风化和逐渐崩塌的状况十分关注与担忧，他问讲解员李治国：“有没有一个维修规划？”

当听说国家文物局有一个 10 年规划时，他说：“10 年时间太长。”再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回答依然是：“计划是 10 年。”



带队对云冈石窟进行地质地震物探综合调查的陆远昭

陆远昭（1926— ），正教授级高工。湖南省东安县人，1954 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先后在华北煤田地质勘探局 114 队（今山西省煤炭地质 114 勘查院）、山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山西煤田地质局（今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工作。历任总工程师、经理、技术委员会主任。

“3 年搞好！时间长了我们都见不到了。”周总理生前对文物工作做的最后一次直接指示，就这样辉煌地镌刻在云冈石窟的历史上。

随行的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韩英接到指示，斟酌后将任务交给省煤炭化工局地质处。

对一处驰名中外的重点文物进行地质地震物探综合调查，于煤炭化工局地质处而言还是首次。最终，这一重任，落在了水文地质专家、时任地质处副处长陆远昭身上。

而当时的省煤炭化工局地质处，正是今天省煤炭地质局前身。

云冈石窟是与煤炭地质完全不一样的文物，怎么“调查”？可资借鉴的经验一片空白。唯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地质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支撑着整个项目。

罗盘、放大镜、铁锤，山西煤炭地质人带着他们的老三样宝贝出发了。

体 检

到达大同后，大同矿务局、煤化局、地震台等单位的 18 名人员加入队伍，与陆远昭一起前往云冈石窟。

为获得详尽资料，调查组从东到西一个窟一个窟地勘察，细致分析每个裂缝开裂原因。有些洞口被重达千斤的石块封堵，只能爬上爬下选择合适的缝隙开口探入，在没有保护措施的现场，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

45 个主要石窟，他们用了四五天时间逐一勘察。

实地勘察后，进入对崩裂及坍塌原因的排查阶段。

上世纪 70 年代，石窟周围大大小小分布了十多座煤矿。当时大家一致认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周边煤矿和采石场生产爆破引发共振导致的石窟崩裂，所以优先要对煤矿及采石场生产共振数据进行检测。

为了准确测算出爆破生产产生震动对云冈石窟的影响，工作组的同志们采集每一个数据都坚持下矿选定好矿层爆破地址，测量好爆破炸药的剂量，再进行试验。测试结果令人欣慰，震动对石窟的影响为十万分之一，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爆破，采煤厂车来车往，交通对石窟的影响也在考察当中。他们排除了火车、卡车、小汽车，连行人、马车、手推车都不放过。最终发现拖拉机才是“罪魁祸首”。那个年代拖拉机作为主流农业生产机械，使用频率和范围都极广，来来往往间就对云冈的岩体产生了危害。

大型震动除了煤矿，还有地震。历年地震资料显示，建窟以来经历了多次 5 级以上地震。1966 年以来又经受了邢台 7.2 级地震，还有红九矿采空区两次大面积塌陷。事实证明，这些未对石窟造成影响。

除了震动，专家们还想到了水。于是他们又把目光瞄向石窟前的河水……

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因素，逐一排查后专家们的眼神越来越坚定，思路越来越清晰。

支 撑

在周总理与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 14 天之后，调查组《关于云冈石窟文物保护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出炉”了：对于目前佛像残缺不全的原因，除人为因素外最主要原因为自然风化、自然地震和炮震。

自然风化。厚度达 25 厘米到 30 厘米，总风化厚度已经有 65 厘米到 130 厘米。

自然地震。由于地球长期运动，导致浅部岩层破裂或块体相对错动产生的地震造成。石窟带由古河床冲刷而成，处于古河床边缘的石窟长期受地面水的侵蚀冲击，也会促使岩石风化脱落。

炮震。尽管煤矿正常开采放炮对石窟没有影响，但地面采石场放炮震动却比井下采煤放炮震动要大。井下采空区大面积冒顶又比地面采石场一般放炮震动要大。采空区一次严重塌陷的震动力相当于五级地震。

同时，距石窟 350 米的 109 国道上行驶的拖拉机对石窟会有一定的震感。

最后，调查人员形成了五点意见：

一是暂时维持之前文化部划定的 3.6 平方公里保护范围，但建议地震部门作进一步测震实验；

二是要求煤矿正常生产过程中一次爆炸量控制在 10 公斤左右，并要对采石场做进一步测震试验；

三是迅速建立地质及水文地质点及工程地质长期观测点，每年对地面、地下水及矿井排水按时观察，并针对性采取措施；

四是建议测绘 1:2000 地形图，填绘 1:2000 综合地质、水文地质图和工程地质图，为今后工作打基础；

五是建议 109 国道改道。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从 1974 年到 1976 年，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原则，国家对云冈石窟实施了“三年保护工程”，对毁损严重



2018 年 5 月 7 日，山西省煤炭地质局组织召开全省旅游景区（点）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价专家咨询会。

的现状进行了治理，抢救了一大批濒临坍塌的洞窟。

整整 3 年后，1976 年 9 月，王冶秋率专家组再次来到云冈石窟对维修情况进行了验收……

岁月不居，难掩明明之德；长烟落照，尽归丽丽河山。

时至今日，陆远昭已经 95 岁高龄，他在《岁月留珍》中曾经这样回忆了这段历史——

鹧鸪天 云冈石佛调查

塞北云冈举世名，佛门圣地洗俗尘。法国总统来朝拜，总理亲言佛洗尘。佛有损，要修身，腐蚀变化找原因。路煤风雨须改正，为保佛身万世宁。

2016 年 12 月 16 日，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为了深入了解当年的地质地震物探综合调查情况，曾专程拜访陆远昭。

48 年前，为恢复云冈石窟健康的体魄，



张焯（左）拜访陆远昭（右）

开展了一场独特的“体检”；48 年后，山西煤炭地质人初心不改，仍然以担当和智慧，锚定山西“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战略定位，围绕打造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品牌和“游山西，读历史”文化旅游规划，主动融入全省智慧旅游建设，积极开展全省典型旅游资源地质环境调查评价、云冈石窟保护监测等工作，探索旅游地质环境保护的山西模式，为全省文旅产业发展贡献着新的力量。

（据微信公众号“文博中国”）

先生们与《敦煌艺术大辞典》

□赵声良

百年之业

敦煌，一个流光溢彩的名字。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元，多个民族在此生活，多种文化在此汇聚。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目光投向了敦煌。

敦煌飞天、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乐舞……凡是与敦煌相关的名词，渐渐地成为大众所熟知的内容。然而，敦煌艺术走出西北一隅，其实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光。

时间回到百廿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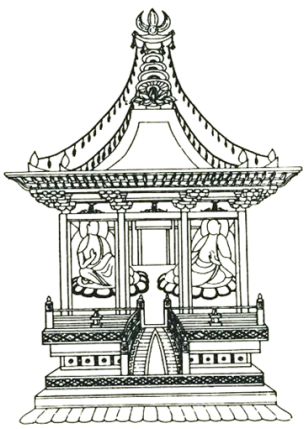
1900 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即今编号第 17 窟）内发现的数万件古文献及数百件精美绘画，震惊了英国人斯坦因和世界考古学界。那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地方官员贪婪短视，藏经洞出土的文物没有得到任何有效保护，大量经卷、绘画被劫掠至海外。直至 1909 年，清政府才下令把剩余的一万多件文物运回北京。藏经洞发现的文物，吸引了中外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也由此形成了一门对世界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学问——“敦煌学”。但是，尽管敦煌学已成为显学，但在藏经洞发现之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除了北京大学陈万里陪同美国人华尔纳到过一次敦煌外，中国几乎再没有一个学者亲自到敦煌石窟进行过实地考察。



《敦煌艺术大辞典》敦煌研究院编
樊锦诗 主编 赵声良 副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37 年，一位叫李丁陇的画家，专程赴敦煌石窟临摹壁画，并将临摹的画带到内地展览，由此让敦煌艺术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在李丁陇的帮助下，画家张大千也抵达敦煌，在敦煌停留达三年之久。张大千不仅临摹了大量的壁画，还对石窟的内容做了详细记录。在这前后，考古学家向达等人也来到敦煌，对石窟进行研究，对敦煌周边的文化遗迹进行考古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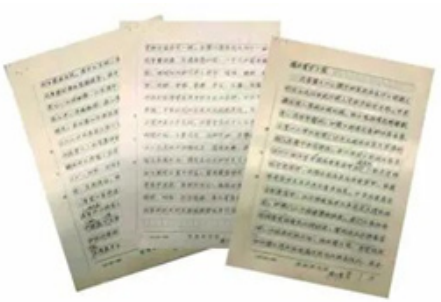
1943 年春，常书鸿先生跨越千山万水，



参与编纂《敦煌艺术大辞典》的孙儒僩先生绘制的莫高窟第 237 窟单层木塔图

来到敦煌。他放弃的，是法国巴黎优渥的生活和扬名国际画坛的机会。在他的组织下，敦煌首个专门性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次年设立。一批学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研究人员李浴、史岩等先生，启动了对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的调查整理，这是敦煌艺术基础研究工作之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敦煌文化遗产，加强了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拨巨资进行莫高窟的全面保护维修工程，取得了重大成果。敦煌艺术研究的新时代来临了。



参与编纂《敦煌艺术大辞典》的刘玉权先生的手稿

首先，在壁画临摹的基础上展开了石窟历史与艺术的研究。在北京大学宿白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系统的石窟考古研究。与此同时，对壁画图像内容的考证研究也全面展开。1981 年，中日合作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5 卷）出版，集纳了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对石窟年代的考古分期研究、各时期石窟艺术风格的研究以及部分壁画图像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还先后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书，为学术界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资料。1984 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机遇。此后，不仅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不断发表论著，相关基础资料和研究成果，还推动了国内外学者对敦煌石窟艺术与考古的研究。

百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敦煌壁画中主要的内容，如佛教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传统神话传说等内容基本上都已考证清楚；各时期供养人像及题记的系统调查研究业已展开；敦煌大部分洞窟的时代基本确定；对敦煌石窟各时代的艺术风格特征有了基本的认识；造型艺术、音乐、舞蹈以及服饰等方面的研究也全面展开。这些，都为《敦煌艺术大辞典》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年之功

季羡林先生曾说，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敦煌是如此气象万千，以至于要将其内容囊括于一本典籍中，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



《敦煌艺术大辞典》壁画类词条

20 世纪 90 年代起，在季羡林先生主持下，国内敦煌学界专家学者们共同参与编纂，完成了《敦煌学大辞典》。这一巨大的工程耗时数年，共有 120 余位学者共襄盛举，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敦煌学大辞典》于 1998 年问世后，敦煌学研究仍然处于高速发展的轨道，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等领域，陆续推出了新的论著成果，如 1999—2005 年陆续出版的 26 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刊布了北区考古调查重要成果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1—3 卷）。上述诸多新内容，在编纂《敦煌学大辞典》时并未产生，学术界普遍感到有必要修订《敦煌学大辞典》。与此同时，随着敦煌艺术日益深入人心，广大读者渴望有一部既可全面查阅，又可作为欣赏敦煌石窟及相关艺术内容的著作。《敦煌艺术大辞典》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策划编纂的。

2004 年，樊锦诗院长对我说，要编《敦煌艺术大辞典》。当时，我刚取得美术史学的博士学位从日本回国，担任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主任，她叮嘱我，要认真组织好、完成好这项工作。我们在与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辑张晓敏先生商谈此事时，大家都意识到，敦煌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关注，《敦煌艺术大辞典》的编纂，势在必行。

很快，我们就成立了编委会，开始了编撰工作。我以为，有《敦煌学大辞典》的珠玉在前，再进行扩充、改写或重写，应该不太困难。但是由于敦煌艺术的体系庞大，工作量极大。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很多以前收入《敦煌学大辞典》的条目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大部分旧词条的作者或年事已高，或已故去，不得不在另请学者修改或重写。工作繁复琐屑，我们的编撰时断时续，竟延续了十多年。在这期间，有些最初参与写作和修改的作

者都已去世，令人无限伤感。

辞典是工具书，需严谨准确，作者必须对词条涉及的内容有所研究，才有可能写出正确的释文。因此，尽管是几百字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也必须字字斟酌，反复考量。有时，写几个词条所花费的时间与学力，不亚于写一篇论文。

饶是如此琐屑，参与辞典编纂的先生们却依然非常认真。

年届九旬的建筑史专家孙儒僩先生，对他的词条反复琢磨修改，还一一配上他绘制的线描图。在“莫高窟第172窟城楼图”中，不仅建筑的飞檐、斗拱、窗牖、廊道一一可见，四名正在站岗的守备也栩栩如生。“莫高窟第237窟单层木塔图”中，塔的雕饰、佛像的手势都清晰可辨。

考古学家刘玉权先生增补的一批词条，用工整的钢笔字誊抄在标准稿纸上。泛黄的稿纸，仔细记录着老先生的研究心得。只需略作阅读，就可感受到他简素文字里沉潜多年的功底：“窟顶藏密样式的金刚曼荼罗图像，其明王头大、腿短而身长，球状眼睛、咧齿，作忿怒像，奉无量寿佛降魔。从内容到形式均系典型藏密绘画风格。”

每每看到这些老先生的文稿，我就生出由衷的敬意。

当这本厚达715页的辞典终于付梓时，我将它拿在手上，感受它沉甸甸的分量，不禁感慨万千：这不是一本普通的辞典，而是敦煌艺术研究几十年历程的见证，是几代敦煌艺术研究者毕生之研究精华的汇总。我希望，当读者拿起这本辞典时，能够感知中国古代即拥有如此宏大、如此精美的艺术，能通过敦煌艺术进而知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千年神采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其后陆续营建了大量的佛教洞窟，从4—14世纪，延续了千年之久，创造了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唐宋木构窟檐5座。

《敦煌艺术大辞典》，则力图汇总敦煌艺术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历年的研究成果，展现敦煌艺术千年的神采。

全书收录28类、近3000个词条，含1000余幅图片，约140万字，集纳了敦煌石窟（包括建筑、彩塑、壁画）、敦煌历史遗迹遗物以及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领域学术词语和专业知识、历史人物、著作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以艺术词汇为例，收录了佛教、历史、考古、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服饰、装饰、书法、篆刻等领域词条。书里甚至还有古代天文学、农学、化学、军事等方面词条，可谓百川汇流、万象包罗。

在编纂词条时，我们尤为注重的是体现最新研究成果。此处，可列举一二。

莫高窟北区洞窟，不同于南区洞窟。南区洞窟以大量精美的塑像、壁画为主，北区洞窟则少有塑像和壁画。通过20世纪80—90年代的考古发掘发现，北区石窟主要是禅窟、僧房窟、僧房窟附设禅窟、廪窟、瘗窟等，是古代僧人修行、生活起居及埋葬死者的洞窟。除弄清了北区洞窟真正的功能和性质外，此次考古还发现了大量珍贵遗物，有各种语言文字的古代文献，如汉文《杂阿含经》、叙利亚文《圣经》文选、藏文令旨、西夏文活字文献《诸密

咒要语》、回鹘文文献《阿毗达摩俱舍论实义疏》、八思巴文《善说宝藏》、蒙古文对汉语音译文书等，还有泥质佛塔、木雕像、纸画、绢帛织物、景教铜十字架、蓝宝石金刚杵、铜八角器、梵文和八思巴文印章等，对研究我国古代民族融合和历史，以及古代中外交往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北区考古发掘在上个世纪末才结束，大量重要资料虽在 2004 年出版的考古报告中公布，但一般读者不一定会读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本辞典收录了数十条北区洞窟及出土文物的词条，有助于读者了解莫高窟的全貌。

另外，敦煌艺术由于涉及学科极为广泛，内容十分复杂。有的内容以前作了定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了新成果，推翻了前人的定论。如这本辞典中关于莫高窟第 321 窟南壁的壁画，在 1998 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中定名为“宝雨经变”，后来经学者研究，这铺经变应为“十轮经变”，《敦煌艺术大辞典》就采用了“十轮经变”的说法。当然，对于一些学术界仍存争议的内容，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如果不能证明前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仍然保持学术界长期形成的看法。

辞典由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任主编、院长赵声良为副主编，敦煌研究院及国内敦煌学界七十余位学者共同撰写完成。

为了保证解释的权威性，每一类词条，都由这方面的权威专家来撰写。大量石窟艺术词条，由老一辈敦煌研究专家段文杰、史苇湘、孙儒僩、万庚育、施萍婷等先生撰写；石窟考古类词条，由樊锦诗、贺世哲、孙修身等先生撰写；历史类词条，大部分由李正宇、郝春文、荣新江、陈国灿等先生撰写；音乐舞蹈类词条，由王克芬、郑汝中、董锡玖等学者撰写。除了老一辈学者外，近二十年来活跃在学术界的专家如王惠民、赵声良以及敦煌学研究新秀张小刚、赵晓星、孔令梅等学者，都承担了部分词条的撰写。而莫高窟北区考古发现的新内容，则由主持莫高窟北区考古工作的彭金章先生和参与此项考古工作的王建军撰写。

由于这本辞典的编撰，进行了十多年，因此，这项工作是由几代敦煌学者共同完成的。如果从年龄结构来看，我们的作者队伍，既有出生于上世纪初的耄耋长者，又有各年代出生的学术中坚，也不乏上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新秀。

作为艺术大辞典，这本辞典改变了过去辞书以文字为主、图片较少较小的状况，照片全彩印刷，特别是重要的壁画、彩塑作品，往往以通栏甚至整版印制。此外，还辅以很多线描图，把敦煌壁画的很多细部，清晰地展示出来。1000 多幅图片，使辞典具有较强的艺术展示功能，利于敦煌艺术爱好者欣赏和学习。

学无止境。以敦煌艺术这样庞大的体系来说，不论是历史、考古，还是艺术等各方面，都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因此，本辞典难免会出现疏漏或错误之处。

然而无论如何，辞典历尽艰辛，终得出版。它是我们几代学人，献给敦煌的一份敬意和深情。

（据微信公众号“北朝考古”）

孙机：考古能看得见历史，也能望得见未来

□中华书局 李静



孙机先生

2020年国庆节，孙机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即将由中华书局付梓，我去拜访他。老先生高兴地谈起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关于考古工作的讲话，还拿出不久前的《光明日报》读给我：“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这话说得太深刻、太精准了！”孙机先生说，不仅要把我国的考古发现研究透，而且要让古代的社会生活活起来，这里面包含着文化自信，加强文化自信的目的是加强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我们考古工作者肩负着这么一个任务。”

要由小见小，也要由小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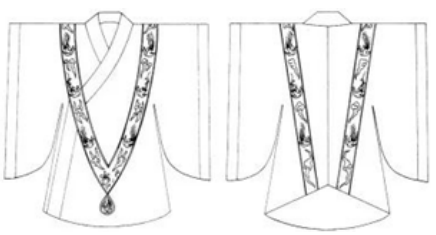
年轻时，孙机曾想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物源》。那时，他的学术兴趣是探究事物的来历，他想要弄清楚世界上那么多千姿百态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会向何处发展。回想几十年的学术之路，虽然没有写出一部名为《物源》的著作，但孙机的研究一直与“物源”息息相关，他也一直保持着最初的那份念想。

这些年来，各地出土了很多文物，有些盆、罐、瓶，人们一看就明白，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也有些东西，学界一直不知道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文物能够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注解，但有些古代的东西没有流传下来，慢慢被湮没在历史里，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了解它们的用途，就有必要探索“物源”。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霞帔坠子，一个是三子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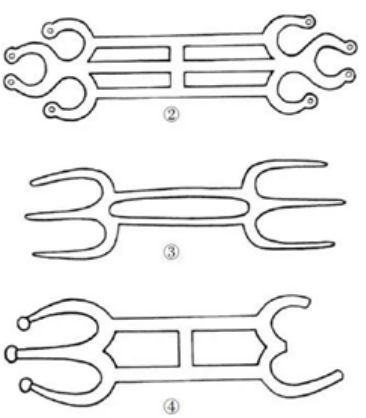
北京昌平明定陵出土的霞帔坠子，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东西叫霞帔坠子，应该尖朝上。霞帔是从肩膀上垂下来的飘带，帔底下就是个坠子。追溯起源，霞帔在唐代就已经出现，经过



北京昌平定陵出土的明代金帔坠



明刊《中东宫冠服》中的霞帔与帔坠



从上至下分别为河南洛阳烧沟东汉墓出土的三子钗、北京顺义西晋墓出土的三子钗、广东广州西北郊东晋墓出土的三子钗

唐宋的发展，到明代，霞帔及坠子的佩戴规定已经严格，这个小物件的变化，反映了中国舆服制度的一个侧面。

三子钗的辨识也很有意思。三子钗多为铜制，一般长 15 到 17 厘米，当中为长条形横框，两端为对称的三叉形，在一具未被搅动的女性头骨上端出现此物，才给人启示，这可能是妇女用的发饰。

讲到这里，孙机拿出他的旧作《从历史中醒来》，翻到山东临沂西张官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女神像，头上清清楚楚地戴着这种发饰，“这样我们就可以确认无疑这是一种发饰，但是叫什么名字呢？这就需要到文献中去找答案。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物件是三子钗，又名三珠钗”。



山东临沂西张官庄出土的东汉画像上戴三子钗的神灵

孙机说，这些只是“由小见小”的例子。霞帔坠子也好，三子钗也好，都是些小物件，把它们说清楚了，也只是说清楚了一个装饰品或者一件小事。研究古代文物，不仅要“由小见小”，而且要“由小见大”。一件东西说清楚了以后，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可能都会有新的认识。

让古代的社会活起来

全盘整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遗产，目前还很有难度，尤其唐代以后的文献浩如烟海，想要穷尽几无可能，但整理一个朝代还是有可能的。孙机选择了以汉代作为横切面，先让一个朝代“活起来”。他的尝试，主要就体现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里。

孙机的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研究，既

包括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内容，也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内容。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这本书里，孙机把汉代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事物，分成了100多个小题目，衣、食、住、行，农业、手工业、冶金、采矿等生产生活方面都包括在内。对这些汉代物质文化资料的每一个方面，孙机都会从基础讲起，细致梳理源流。

“过去，有的国家把考古研究所叫物质文化研究所，这就是说，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物质文化，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还有的国家，把考古学科放在人类学里，主要侧重于史前史，就是人类进入文明以前，没有文字的时代。做这个时代的研究，只能采取层位学、类型学的方法对具体的物质进行研究。但考古学在确定文物的年代之后，还要复原社会面貌。”

实物和文献记载结合，是孙机从事文物研究的重要方法。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是指考古的文献和传世的文献相印证。现在的二重证据，是要将实物和文献相结合，这样就能把历史事件解释得更活了。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只要是真的、可靠的，与器物研究有关系，就可以不拘一格，拿来互相对照，扩大印证的范围，使古器物和古文献“打成一片”。

呈现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孙机专注于汉代物质文化研究，已经有四十年了。他说，这本《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出版后，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修改了，所以叫“修定本”。这是他最看重的学术成果。

从横断面来说，孙机的研究考察了汉代基本物质文化资料，从纵向来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但是他谦逊地认为，即便如此，自己仍没有能力将各个断代的物质文化都以像《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那样的方式研究出来，其他时代的研究只能有待来者，“考古工作不只是‘由小见小’‘由小见大’，或者考古和文献相结合，还要通过对考古成果的研究，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这就不是理清几件文物的名称和用途的问题，摊子还要铺得更大”。

在他看来，研究古代物质文化，不仅能让人们更加了解、热爱祖国的历史，而且能为今天的建设提供动力，“我们说考古对社会有用，不是说考古能为今天的社会生活直接提供一个什么新技术，而是说考古可以增加文化自信，进而加强爱国主义”。

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华文明在很多领域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原来只说中国有“四大发明”，其实，中国有很多发明创造影响了世界。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指出，中国有70项发明曾经领先世界，后来传到了欧洲。



孙机（左）与李约瑟合影

前些年，有学者提出，中国的马车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孙机对古车做了大量研究后认为，中国古车与西方古车完全是两个体系，差别极大：从构造上说，有大轮、小轮之别；从系驾法上说，有轭鞅式系驾法和颈带式系驾法之别；从性能上说，有用于车战和用于运载之别。距今约 3700 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双轮车的辙痕，从考古上证明中国此时已经有车。中国马车出现的年代与中亚、西亚马车出现的年代相仿，并不存在西方已有了成熟的车型而中国紧随其后的情况。

孙机又举了球墨铸铁的例子，1947 年，欧洲的冶金专家才研究出现代的球墨铸铁技术。球墨铸铁比一般的铸铁强度更为增加，机械性能也更为改善。让人惊讶的是，在河南巩义铁生沟冶铁遗址出土的西汉铁器里，就检验出发育良好的球状石墨，它的球化率甚至符合现在的国家标准。

考古不只是往后看

1955 年，孙机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在北大，孙机最亲近的老师是宿白先生。宿白先生告诉他，考古研究要多读书，而且要读有用的书，读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物质文化方面的史料，史料里会有很多“触角”，这些“触角”会触及方方面面，有些东西就会互相联系起来，成为学术研究的入口。

宿白先生 1957 年发表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让孙机印象深刻。这本书不仅把壁画中反映的历史说得很清楚，而且文字生动，书中引用的文献大多是第一手材料和最好的版本。孙机一直谨记宿白先生的教诲，在北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也常常利用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虽然读书很少有直接的发现，但读得多了，把各种书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问题。

学考古的学生都会上考古绘图这门课，孙机也受过这个训练，而且特别重视。在他的著作里都配有他自己画的线描图。孙机说，从年轻时试写论文开始到《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这么多年积累了上千幅古代器物的线描图。画图不容易，有的时候，他吃完晚饭就坐下来开始画，等画完了，抬头一看，天都亮了。现在印刷条件好了，很多考古、文物图书都直接采用照片而不用线描图了。但孙机认为，线描图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把要表现的细节刻画得更清楚。这次出版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有百余幅线描图因为原版的效果不太理想，是他重新画的。他觉得，如果不重新画，就那样黑乎乎地印出来，太对不起读者了。

如今，“大众考古”“公众考古”的说法很流行。孙机说，“大众考古”不是让大家都去考古，而是让大家了解考古的知识。地下文物归全民所有，进行发掘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考古学家是奉政府的命令去挖掘，这就是他的工作。向大众普及考古知识，应该重在普及考古的成果，而不是普及田野考古的技术或方法。

如今已经 91 岁的孙机，仍然关心着当下的考古事业和国家的发展。他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向前看，考古学不是让人们往后看，而是让我们增加向前的动力。

（据微信公众号“国博君”）

宁波：云冈石窟数字化 如何应用与存储数据？

□李家丽

不同于今日文物数字化的如火如荼，2005 年，云冈石窟对窟内文物进行数字化时，国内“石窟界”数字化工作大多还没开启。

一路走来，有艰辛，但更有满满的收获。

2003 年，云冈石窟研究院与多家科研院校合作，开始尝试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应用。

2005 年，云冈石窟研究院与北京建筑大学合作，采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云冈石窟东西长近 1 公里、高 20 多米的外立面进行测绘，首次制作云冈石窟外立面完整点云数据及正射影像图各一套。

随后 10 年，云冈石窟研究院潜心研究数字技术，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终于在 2015 年，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共同成立“数字云冈联合实验室”，文物数字化保护正式步入发展快车道。

2016 年，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处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生成洞窟中各个方向的剖面图，使洞窟得以多角度展示，为云冈石窟建起了三维的“数字档案”，并上线“云冈石窟全景漫游”。

2017 年，云冈石窟研究院联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多图像三维重建技术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对云冈石窟第 3 窟实现 3D 打印，系全球首次运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大体量、高精度文物复制。

2019 年 11 月 11 日，山西省文物标准化委员会公布，由云冈石窟研究院主持编写的《石窟寺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技术规程》和《石窟寺文物近景摄影测量三维数字化采集技术规程》经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批准，正式作为山西省地方性行业标准发布。

如今，云冈石窟数字化更是走出云冈，走入北京明十三陵的长陵祾恩殿、山西运城广仁王庙、五台山南禅寺以及永乐宫和华严寺等，帮助其他文物单位建立数字档案。

准确再现云冈石窟砂岩被风化的颗粒感和经历千年历史的沧桑感，云冈石窟已经为石窟文物提供了很好地范例。那么，云冈石窟研究院的数字化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如今石窟数字化的“行业标杆”如何练就？实际工作中，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

为此，雅昌艺术网 & 艺术头条独家对



云冈石窟数字化过程

话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室主任宁波。

雅昌艺术网：同敦煌的二维文物不同，云冈石窟的文物是三维的。在三维石窟的数字化进程中，云冈石窟研究院遇到了哪些困难？

宁波：同敦煌相比，云冈石窟的数字化是三维的，很多敦煌数字化用到的技术无法直接应用到云冈石窟上，我们也是用了 10 年时间攻克这个难关。

而且和博物馆藏文物相比，云冈石窟的数字化具有急迫性。博物馆文物储存环境是恒温恒湿，安全是有保障的。但石窟暴露在户外，风吹雨淋，不保护很快就会被自然破坏。这也决定了，云冈石窟的数字化文物保护是第一要务，展示和传播只是第二要务。事实上，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云冈石窟，古建也是这样。所谓“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有全国 70% 以上的早期古建筑，一场火灾就可能毁灭殆尽。

这是一些大方向上的困难，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最主要的问题是石窟文物的特殊性：

第一，体量大。有些造像大至 7.3 米，最小的造像是 2 厘米，有些洞窟连绵一公里。

第二，空间结构复杂以及造像雕刻精细。如前所说，洞窟大小差距极大，再加上云冈石窟是空间艺术，洞窟造像十分精细。即便转化为三维数字，要想在模型中，体现洞窟空间的纵深感和文物精细度，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依然是个难题。

第三，地理环境恶劣，有些洞窟开凿于断崖上，采集十分困难。

因此，如果要按照同一种数据标准采集洞窟，数据量将十分庞大。大量数据的存储和运用，又是难题。现在石窟正在逐年风化，也无暇顾它，只能先采集，把文物样貌留存住。

我们现在做数字化的目的是把洞窟信息流传下来，以备未来修复。即便无法修复，也可以为后人留存一份云冈石窟图像。我们现在的三维采集精度能达到 0.03㎜/

点间距，同像分量达到300DPI，分量重每毫米能达到12个像素点，分辨率能达到8k。对于一些体量庞大的造像，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把造像划分区域，逐块采集，最后在计算机上再逐块拼贴。鉴于此，采集的话，我们只需要1-2个月，但后期处理就至少需要半年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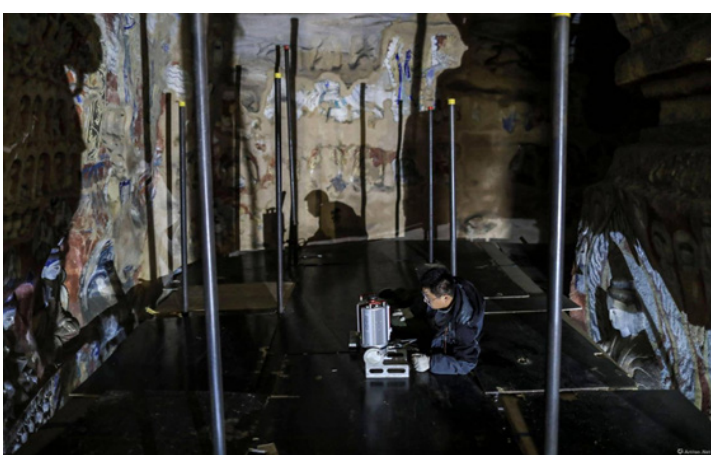
雅昌艺术网：您刚刚谈到数据的存储和运用，是一大难题。现在有无解决的办法？

宁波：2021年，我们打算建立一个运算能力较强的超算中心。刚刚我说到，云冈石窟数字化的数据很大，合成模型大概需要500G-1T的数据，放在电脑里不好处理。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在超算中心，让数据在后台运算，在前台用普通的PC远程访问。有点类似于视频客户端。

我们已经跟国家建议，在云冈石窟研究院建立区域性的数据中心，联合其他地区石窟数字化数据形成一个网络，最后形成国家洞窟大数据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馆内数据可以交流，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开放给公众应用，使这些数据成为社会资源。现在我们的想法是把这个



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室庞博手持三维激光扫描仪一边扫描一边检查电脑上的实时画面。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室王家鑫在设置站式三维激光扫描仪，该扫描仪可以记录整个洞窟空间尺度，与近景摄影测量、手持三维激光扫描一起完成数据采集。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体系打造成如同手机导航软件：数据在后台是安全的，软件只是起到调用的作用。

雅昌艺术网：如果要建成网络，不同馆之间的文物数字化数据标准也是一个问题。

宁波：对。数据过于庞大，传统的算法无法运算各馆组合起来的巨量数据，需要单独开发一套程序。

雅昌艺术网：目前，馆内的数字化进程如何？

宁波：大体完成总体洞窟的1/3。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的效果也会逐步完善，速度可能也会加快。

雅昌艺术网：有了这1/3洞窟的数据化成果之后，在具体的工作当中，云冈石窟研究院如何应用和推广？

宁波：留存资料后，实体保护是我们的第一目的。我们可以根据数字化成果查看原式图案、施工规划、控制工程量等等。撰写考古报告时，数字化也可留存、提供很多资料。

展示，是留存资料的第二目的。2020年底，云冈石窟联合雅昌，把云冈石窟的一些洞窟“搬”到了上海宝龙美术馆。但并不是所有窟都能“搬”出去。那么，这时候洞窟数字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远在千里的观众观赏石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只需要一个VR眼镜，就可以看到云冈石窟。

雅昌艺术网：为什么会选择做12窟？馆内按照什么标准选择洞窟数字化先后顺序？

宁波：选择12窟是因为它是较为代表性的洞窟——12窟又称音乐窟，包含了将近56种乐器，是古代乐器的集中体现。而且它的体量不算太大，放在美术馆的空间是合适的。这一次仅做了洞窟复制，下一步我们准备复原12窟乐器的音乐、服饰、石窟样式等等。

在石窟选择上，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那些损坏较为严重的洞窟，而不是云冈最为精妙的石窟；其次，我们每年都会协同修复等其他部门制定保护方案，决定先对哪些文物进行数字化，以便其他部门使用数据。修复后，我们也会对文物再做一次采集，记录文物的动态过程。

雅昌艺术网：在采集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文物的安全？

宁波：从2003年至2014年，我们逐步建设了自己的数字化队伍，他们对文物是有敬畏心，有感情的。如何搭三脚架、如何施工、电火如何防范，我们都有详细的规章制度。

雅昌艺术网：技术的更新是很快的。云冈石窟数字化运用的是先进的技术，但可能5年后，现在的技术很快就会落后，无法为文物修复提供材料。馆内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宁波：这是一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当几年前，我们还在用诺基亚的时候，也不太可能想到今天的智能手机会如此发达。但我们并不会因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而当下停止使用诺基亚。所以还是需要先把意识扭转过来，以现在的最高水平把数据留下，数字化进程中，这些数据才是未来最核心的资产。

（据雅昌专稿，
云冈石窟的艺术号—艺术头条）

近年北魏墓志整理中误收的伪志

□刘琴丽

进入21世纪以来，墓志整理尤其是中古墓志的整理出版蔚为大观。众多的新墓志让读者目不暇接，也让编者不断逐新，纷纷争取首刊权，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学界对新墓志的追逐和研究。在逐新的背后，我们也应该进行反思和检讨。在这些所谓新出土墓志书籍中，除重出的部分墓志外（所谓“重出”，是指很多新出版的墓志书籍中存在曾经刊布的部分墓志），新刊发的墓志是否都是真正的“新”志？由于盗掘盛行，很多墓志没有具体的发掘时间和地点，这就为伪志充斥其中提供了机会；学术梳理的不足，则使得很多墓志读者甚至编者难以准确无误地判定墓志的新旧和真伪。因此，在当今整理出版的墓志书籍中，清末、民国时期的墓志尤其是伪志偶有混杂其中。如果不及时对这些伪志进行清理，可能对学术研究造成不良影响。

01 太和八年（484）《处士李端墓志》

该墓志著录于民国时期黄立猷《石刻名汇》（《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2册）卷二：“太和八年正月，存，正书，疑唐志改刻年号”。《石刻名汇》首先疑其伪刻，认为是由唐代墓志改刻而来。顾燮光《古志新目初编》（《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8册）卷四也著录了该志：“正书，太和八年正月四日，审系唐刻改刻年号。”《古志新目初编》直接指实其为伪刻墓志，系唐代墓志凿改年号而来。后来，王壮弘、马成名《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沿袭《石刻名汇》的观点，疑该志系伪刻。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则直接将《李端墓志》附入“伪志（包括疑伪）目录”。

可见，《李端墓志》是学术界大体公认的伪志。然而，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在对该志未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以其为真品收录在该丛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编《中国金石集萃》（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也将该志当作真品，收录在该丛书第8函第1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无疑与编者对该墓志学术梳理不够彻底有密切关系。

02 太和十八年（494）《陶浚墓志》

顾燮光《古志新目初编》卷四“伪作各目”最早著录了《陶浚墓志》，判定其伪刻。然而，由于《古志新目初编》为碑目题跋类书籍，这一判定并未在学界引起太多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诸多书籍纷纷以《陶浚墓志》为真品进行著录，且没有任何备注说明。例如，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三册（线装书局2008年版）相继刊布了该墓志的图版和录文，韩理洲《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收录了该方墓志的录文，俨然以其为真品。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撰文，指实该墓志为赝品。例如，李檣《〈陶浚墓志〉志疑》（《东方艺术》2012年第20期）从其中的官职错误、代系缺失以及文章、书法等方面，指出该墓志“应是今人为鬻志石或拓本杜撰而成”。李檣以为今人作伪，然而从《古志新目初编》的著录来看，其实则是民国伪志。刘灿辉《洛阳北魏墓志的作伪、考辨与鉴别》（《中国书法》2017年第20期）以《陶浚墓志》为例，指出其作伪手法系“依托史书典籍，捏造名人墓志”。可见，近年来的学者文章肯定了《陶浚墓志》民国时期的伪刻说。因此，在整理墓志时，一定要留意民国时期的碑目题跋类书籍，以及当时人对墓志的真伪判定。

03 延昌二年（513）《安乐王第三子给事君妻子韩氏墓志》

该墓志在顾燮光《古志新目初编》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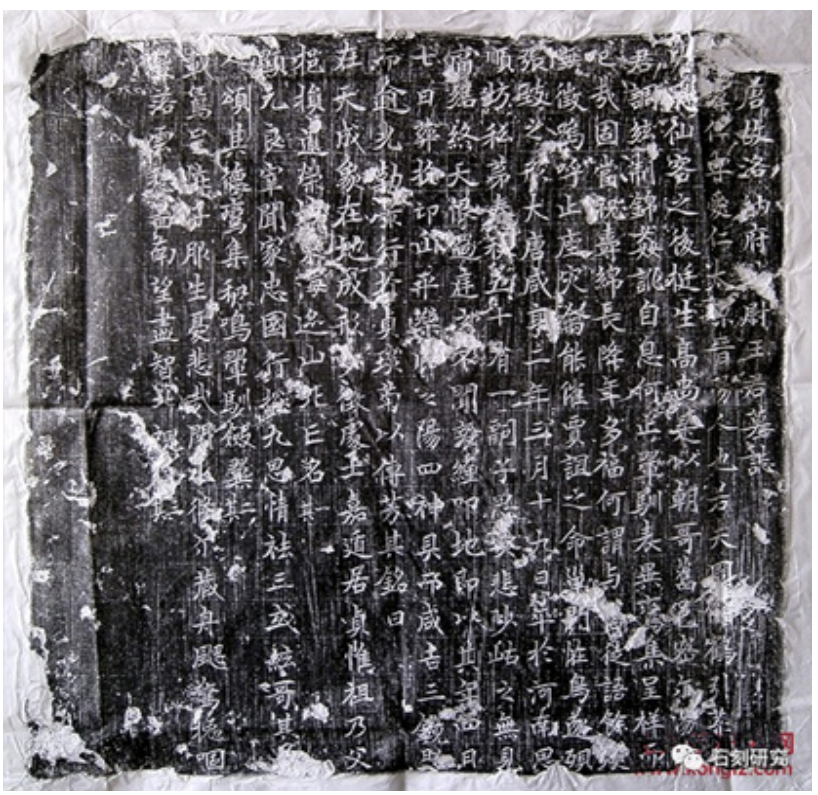


四和《元氏志录补遗》两书中都曾有著录，《古志新目初编》将其列入“伪作各目”中，判定其伪刻。然而，《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册）忽略了《古志新目初编》，刊布该墓志图版时未作任何说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刊布了该墓志的录文，指出“此志所记干支均不符，疑伪”。

然而，《中国金石集萃》依然以其为真品收录，将该志置于第8函第3辑。罗新《北大馆藏拓本〈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指出，该志系篡改北魏《元愿平妻王氏墓志》而成。既然该志已被证实为赝品，按理不应该再被误收。但是，韩理洲《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依然收录了该方墓志。后来，马立军《北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与〈元理墓志〉辨伪》（《江汉考古》2010年第2期）、王培峰和李继高《北魏延昌二年〈韩氏墓志〉伪作说补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再次指出该墓志为赝品。然而，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一书，竟又以“新志”身份刊布了该墓志的图版，简介云2004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谬误更甚。

04 孝昌三年（527）《王仁墓志》

该墓志于民国时期顾燮光《古志新目初编》卷四已有著录，列入“伪作各目”系列，认为其为赝品。朱亮主编《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还特意以其为伪刻墓志刊布录文，编号“伪刻三八”，惜未见拓本。

但是，这些信息却被部分学者所忽略，后来出版的金石书籍大多误以其为新志或真品收入。例如，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2004年版）刊布了该墓志的图版，因墓主姓王，名仁，字怀本，故题为《王怀本墓志》，简介云“2000年8月于河南洛阳出土”，显然忽略了前人的著录。后来，韩理洲《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也收录了该方墓志的录文。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版）又刊布了该墓志的图版，题为《王仁墓志》。早在民国时期，该墓志已被认定为伪志，2001年还被当作伪刻范例刊布。由于部分编者的学术梳理不够彻底，以至于该墓志近年来几乎被视为真品，且没有任何备注说明，让人讶异。

05 全面掌握著录历史和学术前沿

北魏景明元年（500）《曹永墓志》于《古志新目初编》卷四“伪作各目”最早著录，并被判定为伪刻。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线装书局2008年版）、韩理洲《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都将其当作真品收入，不作任何备注说明。这一疏漏必将影响读者对于墓志新旧和真伪的判断。另外，拙文《近年出版〈新中国出土墓志〉所收伪志举隅》（《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曾指出，《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误收的北魏正光五年（524）《谭棻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上海天津》所收《卢子真夫人李氏墓志》，均为民国时期即已判定的伪志。可见，在墓志整理工作中，若不能全面掌握单方墓志的著录历史和学术前沿，就难以避免墓志的出土时间和真伪判定方面的疏误。

以上所举仅仅是北魏墓志，其他朝代的情况如何，笔者还没有做详细考察。为何在墓志整理中会出现伪刻被误作新志刊布的情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盗掘盛行，我们对很多墓志无从知道其具体出土时间、地点，墓志征集者对著录历史不够了解，缺乏对单方墓志的学术寻踪，尤其是忽略了碑目题跋类书籍和当今学者的辨伪文章，从而造成误著和误收的情况。第二，学界对于已出土墓志的学术梳理不够到位，未能提供一部便捷实用的权威工具书，此类工具书应有相关碑志的详细著录情况和相关研究成果，让学者能够迅速了解到单方碑志的著录历史和学术前沿，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如新旧、真伪判定）。

概言之，众多金石书籍纷纷误收已被认可甚至被反复认可的伪志，显然疏忽了单方墓志的著录情况和相关研究成果。如何将金石书籍中的伪志有效清除，以避免赝品的错误记载引发的学术混乱，是今后重要的学术任务。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15日第5版；微信公众号“石刻研究”）

牙结石揭示南亚与近东的食物贸易

□ Ludwig Maximilian
汐莫 译



图 1. 美吉多（Megiddo ）的发掘现场（K 区域）。（图片来源：美吉多调查队）

亚洲的姜黄和香蕉等外来食物早在3000 多年前就到达了地中海，比之前认为的要早得多。一个研究小组与慕尼黑大学的考古学家 Philipp Stockhammer 的合作研究表明，在青铜时代，食物的远距离贸易就已将东西方社会连接在一起了。

想象一下，3700 年前在黎凡特（Levant ）美吉多市的一个市场中：市场商贩不仅在贩卖种满整个地区的小麦、小米或枣子，还贩卖近期才出现的，成瓶的芝麻油和成碗的亮黄色香料。这就是 Philipp Stockhammer 所想象的东地中海青铜时代市场的繁华景象。

慕尼黑大学的考古学家与一个国际团队合作分析牙结石中的食物残留，发现黎凡特人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已经在吃姜黄、香蕉，甚至大豆了。Stockhammer 说：“亚洲的外来香料、水果和油，已经到达地中海几个世纪了，有些食物甚至比之前了解的要早几千年到达。”“这是迄今为止南亚和东亚以外地区，姜黄、香蕉和大豆出现的最早直接证据。”

也有直接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外来水果、香料和油的长途贸易，已经蓬勃发展了。这些食物从南亚通过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到达黎凡特。虽然这些区域的大量贸易，在后来被充分记录，但追踪这一新兴的全球化过程的根源仍旧困难重重。这项研究的发现证实，至少从青铜时代开始，食物的长途贸易就已将这些相距甚远的社会联系起来了。人们显然从很早开始，就对外来食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为了进行分析，Stockhammer 的国际小组调查了从美吉多和 Tel Erani 发掘的 16 具人骨，这些遗址现位于以色列。公元前 2 千年，黎凡特南部地区是地中海、亚洲和埃及之间的重要桥梁。这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析人类牙结石中保存了数千年的食物残留物，包括古蛋白质和植物微化石，来研究青铜时代黎凡特人群的美食。

人类的口腔里充满了细菌，细菌不断地石化，从而形成了牙结石。微小的食物颗粒，会被包埋并保存在不断增长的牙结石中，得益于前沿的方法，这些微小的残余物，现在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之中。研究人员从美吉多青铜时代遗址和 Tel Erani 早期铁时代遗址的多种个体中取样以开展研究。他们分析了有哪些食物蛋白和植物残渣保存在牙结石中。“这让我们能够发现一个人曾吃过什么”，Stockhammer 说，“几千年前的人类没有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牙结石能告诉考古学家他们吃了哪些东西。”



图 2. 来自美吉多的 M50 的 3D 重建（H 区域）。（图片来源：梅吉多调查队）

古蛋白质组学（Palaeoproteomics）是这一日益增长的新研究领域的名称。研究人员希望这种方法可以发展为考古学的标准程序。“我们对来自人类牙结石的古老蛋白质和植物遗存的高分辨率研究，在对古代近东菜肴同类研究中尚属首次”，哈佛大学和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分子考古学家，文章的合作者 Christina Warinner 说，“我们的研究证明了这些方法在检测，原本很少留下考古痕迹的食物遗存方面有巨大潜力。牙结石是有关古代人类生活的有价值的信息来源。”

“我们的方法打破了新的科学基础，”慕尼黑大学生物化学家和主要作者 Ashley Scott 解释说。这是因为将单个蛋白质遗存与特定的食物匹配，并不是一件小事。除了艰苦的鉴定工作外，蛋白质本身也必须存活数千年。Scott 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过敏相关蛋白，似乎是人类牙结石中最稳定的”，她认为这一发现可能是由于许多过敏原具有热稳定性。例如，研究人员能够通过小麦面筋蛋白鉴定出小麦，Stockhammer 说。研究小组随后能够利用一类被称为植硅体的植物微化石来独立确认小麦的存在。植硅体也被用来鉴定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黎凡特的小米和枣椰树，但植硅体并不丰富，甚至并不存在于许多食物中，这就是为什么新的蛋白质发现具

有如此的突破性——古蛋白质组学能够鉴定出几乎没有留下其他痕迹的食物，如芝麻。在 Megiddo 和 Tel Erani 的牙结石中均鉴定出了芝麻蛋白。Stockhammer 说：“这表明芝麻在公元前 2 千年就已成为黎凡特的主要食物。”

Stockhammer 解释说，另外两个蛋白质的发现特别显著。在一个来自 Megiddo 的牙结石中，发现了姜黄和大豆蛋白，而在另一个来自 Tel Erani 的牙结石中鉴定出了香蕉蛋白。这三种食物都有可能通过南亚传至黎凡特。香蕉最初是在东南亚被驯化的，自公元前 5 千年开始在东南亚被食用，4000 年后它们到达西非，但人们对它们的贸易或食用历程知之甚少。“因此，我们的分析提供了香蕉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关键信息。”Stockhammer 说，“以前没有考古学或文字证据表明，它们早期便扩散到地中海地区。”尽管几个世纪后香蕉在西非突然出现，暗示这种贸易可能已经存在。“历史上如此早期的长途食物交换令人震惊。”

Stockhammer 指出，他们当然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其中一个个体在南亚度过一段时间，并只在那才食用相应的食物的可能性。即使香料、油和水果的进口程度尚不明确，但有许多证据表明，贸易确实正在进行，因为在东地中海也有其他外来香料的证据，公元前 1213 年，拉美西斯二世（Pharaoh Ramses II）与来自印度的胡椒一起被埋葬。这些胡椒在他的鼻子里被发现。

这项研究结论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这项研究是 Stockhammer 项目“食物转换——东地中海晚青铜时代食物的转换”的一部分，该项目由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该研究的国际团队包括来自慕尼黑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项目背后的根本问题，即本研究的起点，是澄清青铜时代贸易网络的早期全球化是否也涉及食物。

Stockhammer 说：“事实上，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公元前两千年全球化对东地中海食物烹饪的影响。地中海菜肴以从早期便开始的跨文化交流为特点。”

原文

Food trade with South Asia revealed by Near East food remains

Exotic Asian spices such as turmeric and fruits like the banana had already reached the Mediterranean more than 3000 years ago, much earli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A team of researchers working alongside archaeologist Philipp Stockhammer at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in Munich (LMU) has shown that even in the Bronze Age, long-distance trade in food was already connecting distant societies.

Imagine this scene from a market in the city of Megiddo in the Levant 3700 years ago: The market traders are hawking not only wheat, millet or dates, which grow throughout the region, but also carafes of sesame oil and bowls of a bright yellow spice that has recently appeared among their wares. This is how Philipp Stockhammer imagines the bustle of the Bronze Age market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king with an international team to analyze food residues in tooth tartar, the LMU archaeologist has found evidence that people in the Levant were already eating turmeric, bananas and even soy in the Bronze and Early Iron Ages. "Exotic spices, fruits and oils from Asia had thus reached the Mediterranean several centuries, in some cases even millennia, earlier than had been previously thought," says Stockhammer. "This is the earliest direct evidence to date of turmeric, banana and soy outside of South and East Asia."

It is also direct evidence that as early as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 there was already a flourishing long-distance trade in exotic fruits, spices and oils, which is believed to have connected South Asia and the Levant via Mesopotamia or Egypt. While substantial trade across these regions is amply documented later on, tracing the roots of this nascent globalization has proved to be a stubborn problem.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nfirm that long-distance trade in culinary goods has connected these distant societies since at least the Bronze Age. People obviously had a great interest in exotic foods from very early on.

For their analyses, Stockhammer's international team examined 16 individuals from the Megiddo and Tel Erani excavations, which are located in present-day Israel. The region in the southern Levant served as an important bridge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Asia and Egypt in the 2nd millennium BCE.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uisines of Bronze Age Levantine populations by analyzing traces of food remnants, including ancient proteins and plant microfossils, that have remained preserved in human dental calculu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human mouth is full of bacteria, which continually petrify and form calculus. Tiny food particles become entrapped and preserved in the growing calculus, and it is these minute remnants that can now be accesse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thanks to cutting-edge methods. For the purposes of their analysis, the researchers took samples from a variety of individuals at the Bronze Age site of Megiddo and the Early Iron Age site of Tel Erani. They analyzed which food proteins and plant residues were preserved in the calculus on their teeth. "This enables us to find traces of what a person ate," says Stockhammer. "Anyone who does not practice good dental hygiene will still be telling us archaeologists what they have been eating thousands of years from now."

Palaeoproteomics is the name of this growing new field of research. The method could develop into a standard procedure in archaeology, or so the researchers hope. "Our high-resolution study of ancient proteins and plant residues from human dental calculus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to study the cuisine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says Christina Warinner, a molecular archaeologist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 and co-senior author of the article. "Our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great potential of these methods to detect foods that otherwise leave few archaeological traces. Dental calculus is such a valu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lives of ancient peoples."

"Our approach breaks new scientific ground," explains LMU biochemist and lead author Ashley Scott. That is because assigning individual protein remnants to specific foodstuffs is no small task. Beyond the painstaking work of identification, the protein itself must also surviv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terestingly, we find that allergy-associated proteins appear to be the most stable in human calculus", says Scott, a finding she believes may be due to the known thermostability of many allergens. For instance, the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detect wheat via wheat gluten proteins, says Stockhammer. The team was then able to independently confirm the presence of wheat using a type of plant microfossil known as phytoliths. Phytoliths were also used to identify millet and date palm in the Levant during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but phytoliths are not abundant or even present in many foods, which is why the new protein findings are so groundbreaking—paleoproteomics enabl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foods that have left few other traces, such as sesame. Sesame proteins were identified in dental calculus from both Megiddo and Tel Erani. "This suggests that sesame had become a staple food in the Levant by the 2nd millennium BCE," says Stockhammer.

Two additional protein findings are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explains Stockhammer. In one individual's dental calculus from Megiddo, turmeric and soy proteins were found, while in another individual from Tel Erani banana proteins were identified. All three foods are likely to have reached the Levant via South Asia. Bananas were originally domesticated in Southeast Asia, where they had been used since the 5th millennium BCE, and they arrived in West Africa 4000 years later,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intervening trade or use. "Our analyses thus provide crucial information on the spread of the banana around the world. No archaeological or written evidence had previously suggested such an early spread into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says Stockhammer, although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banana in West Africa just a few centuries later has hinted that such a trade might have existed. "I find it spectacular that food was exchanged over long distances at such an early point in history."

Stockhammer notes that they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course, that one of the individuals spent part of their life in South Asia and consumed the corresponding food only while they were there. Even if the extent to which spices, oils and fruits were imported is not yet known, there is much to indicate that trade was indeed taking place, since there is also other evidence of exotic spic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Pharaoh Ramses II

was buried with peppercorns from India in 1213 BCE. They were found in his nos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PNAS.

The work is part of Stockhammer's project "FoodTransforms—Transformations of Food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Late Bronze Age," which is funded by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The international team that produced the study encompasses scientists from LMU Munich,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 in Jena.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behind his project—and thu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urrent study—was to clarify whether the early globalization of trade networks in the Bronze Age also concerned fo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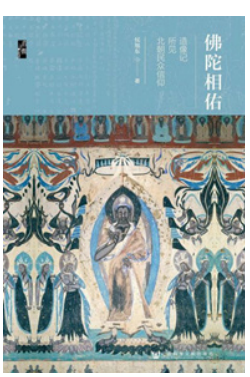
"In fact, we can now grasp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during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 on East Mediterranean cuisine," says Stockhammer. "Mediterranean cuisine was characterized by intercultural exchange from an early stage."

Fig. 1 Excavation of Megiddo (Area K). Credit: the Meggido Expedition

Fig. 2 3D reconstruction of Grave 50 from Megiddo (Area H). Credit: the Meggido Expedition

（据微信公众号“考古资讯”）

书刊推荐



《佛陀相佑》

作者：侯旭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0

简介：

本书主要依据铭刻资料，并结合文献，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五六世纪高僧大德与知识阶层信徒之外的一般佛徒的信仰，试图弄清他们如何接受佛教、接受了什么，进而探讨佛教对普通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在重新考察佛教流行北方的历史背景后，根据1600种有纪年及纪年可考的造像记，借助统计分析，辅以例证，具体展示了民众信仰对象的兴衰变化；剖析了民众对佛教的认识与追求，涉及生死观念变迁、大乘起义的心理基础、民众的社会观念等；还考察了部分民众对法、佛、像与觉悟之途的理解。同时还揭示了造像供养与中土传统祭祀的关系，分析了兴福造像流行的历史意义，探讨了佛教信仰广及朝野的时代意义与影响。

孙贯文先生的金石研究*

□赵超

孙贯文先生生于一九一五年，其父为著名辛亥革命元老孙丹林先生。孙贯文先生作为长子，自幼受到传统国学熏陶，勤奋治学，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而后曾在中国大学任教。抗战时期，孙先生流亡西南，先后任教于成都京华大学与华西大学，并与当时迁移到大后方的众多学人相交。如吴宓先生就在他的日记中记载过孙先生的来访。抗战胜利后，孙先生回到北京，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以后一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及历史系考古专业供职，讲授古代石刻与古文字课程，并参与管理资料室，整理石刻拓片，任历史系考古专业副教授、高级资料员。孙先生长期钻研金石版本、古代铭刻等学术，对古代石刻尤为精通，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专家。因“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致疾，被迫提前退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多批简牍帛书文献资料在考古发掘中出土，国家文物局调集全国著名学者成立整理组，对这些出土文献进行考释整理与研究，并予出版。孙先生也曾被聘请参加整理山东临沂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等重要出土文献；唐山大地震后，又曾参加国家组织的地震历史资料整理组工作。一九七九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聘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研究生。后因辛劳过度，旧疾复发，不幸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去世。

孙贯文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业余时间跟随著名金石学家陆和九先生学习，摩挲研究过大量石刻拓本与古籍版本，具有渊博的学识与良好的学术根底，对中国金石学有着深入广泛的研究，并精于书法与绘画理论。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孙先生曾负责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量石刻拓片，兢兢业业，十余年如一日，做了大量的整理、鉴别与编目工作。特别是结合大量古代金石著录，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石刻拓本进行深入的核对，并做了著录索引。于一九五五年前后编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就是这些工作的成果之一，也是孙贯文先生最重要的著作。

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国内最著名大学的图书馆，所藏书籍资料可入国内收藏最为丰富的大型图书馆之列。尤其是所藏金

* 本文为赵超先生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全二册）所作文章，附于书前，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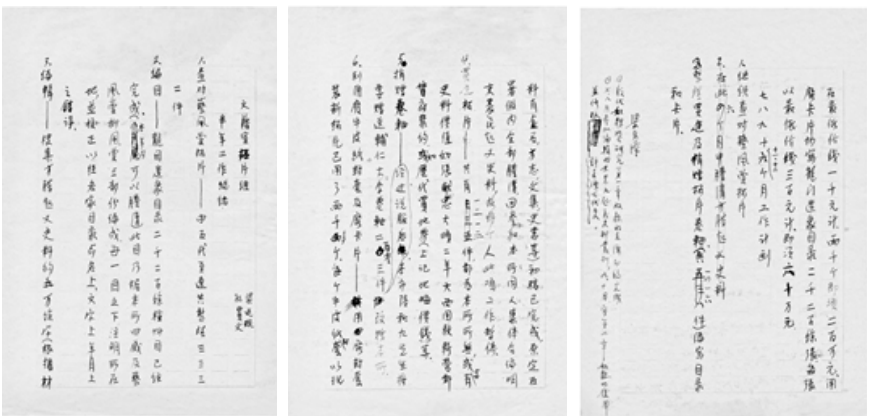


20 世纪 50 年代在北大文科研究所金石拓片组任职

石拓本，数量巨大，在国内位居前茅，可与国家图书馆相媲美。这些收藏除北京大学历年购置者外，还包含了著名金石收藏家缪荃孙艺风堂、张仁蠡柳风堂、张钫千唐志斋及北京庙宇石刻等多处专藏，总数量达两万多种，基本反映了现存的古代石刻面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早期善拓和罕见的孤拓，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则对这些石刻拓本进行全面鉴定、去伪存真、断代排序，按历史年代顺序列出详尽目录，并且对各种石刻进行有关情况的介绍与考证，如石刻的年代、所在地、传流情况、别名、重要特征、真伪、书体、主要内容及有关历代金石著录等，都作了一定的考证与说明。该目录中参考引用了近百种历代金石著录，也是对古代金石学成果的一次检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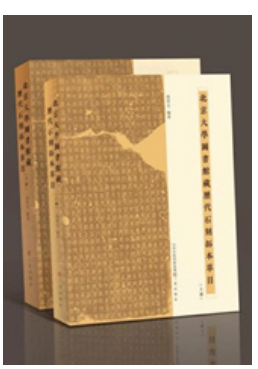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石刻是历代金石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极为重视的古代文化实物资料，范围广，数量大，包含历史资料极为丰富。但是由于散布面广，数量浩大，内容庞杂，对于石刻的全貌以及整体目录始终没有比较完善的了解。以往金石著录中收录最多的金石目录书也不过收录八千多种，而且真伪混杂、重出互见，使得学术界始终不能完整全面地了解古代石刻的情况。因此，整理编辑现存的中国古代石刻目录一直是学术界十分重视的一项重大工作。近几十年来，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都在持续进行着有关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就其编辑体例与内容来说，却都不能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这部诞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未刊著作相比。现有的图书馆藏石刻目录都是就藏品所作的登记目录，很少涉及拓本内容与历代著录研究情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

拓本草目》则不仅是一部比较完备的石刻目录，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通过这部《草目》收集的历代金石著录情况，有关石刻的传世流转、存佚情况和简要考证等，可以了解有关石刻的历史沿革、真伪流传、翻刻覆刻、古代拓本情况、历代研究著述情况等重要的学术信息，并且体现出作者大量的考证工作成果。这部书充分反映了老一辈学者秉承优良的国学传统，发扬乾嘉考据学派学风，踏踏实实奠定学术研究基础的学术风格，这对于当今学术界的浮躁虚假之风也是一个针砭。



1951 年孙贯文拓片组工作总结手稿

该草目编辑体例完备，条目清晰，全部石刻按照年代排序，查找便利，资料性强，具有良好的学术工具书作用。当时限于条件，只刊印了油印本。而且由于当时工作尚处于进行中，仅刊印了已完成的汉代至唐代晚期部分，唐代末期与宋元部分尚未完成付印。但就是这一油印本，问世后便被学术界广泛应用，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影响。由于“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原因，孙先生编写《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这一工作被迫中止。“文革”结束后，北大考古系与孙先生虽然有意继续该项工作，但不幸孙先生又过早辞世，致使该书未能全部完成。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全二册）

近几十年来，由于其重要的资料作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的油印本一直被各大图书馆及学人使用，是限于印数有限，如今已不易得见。由于油印本刊印较早，随着深入研究，孙先生在世时曾在油印本上做了大量增补与改动，以汉魏南北朝时期为最。有些碑刻条目几乎可称为一篇考证文章。徐萍芳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时，曾经力推将该油印本作为考古学专刊单独出版，

并指示孙贯文先生的学生赵超将孙贯文先生修改过的该《草目》整理抄录定稿。但是由于当时出版困难，未能如愿，徐萍芳先生遂改在《考古学集刊》上将该草目陆续刊出。于是限于刊物条件，全目分散在多期《考古学集刊》上，前后体例略有不同，查对使用也存在不便。现在，经三晋出版社大力协助，将其汇总刊印成书，并对以往印本中的一些错误加以校正，可以为读者提供一种最完备、最可靠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版本。

孙贯文先生在古文字研究与古代铭刻研究上付出了毕生精力，多所创见。他在北京大学教授古文字学时，曾较早地采用综合排列各种古文字资料与选取古文字字例的教学方法，对各种古代铭刻文字进行了广泛的涉猎与研究。但是正如很多老一辈学者那样，他对发表文章，提出观点极为慎重，所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不多。这里收集了现在可见的发表在《考古》《文物》等学术刊物上的五篇论文，即《金文札记三则》《由出土印章看两处墓葬的墓主等问题》《芗他君祠堂考释》《明拓孤本大相国寺碑丛考》《重建礼拜寺记碑跋》，以及一部先生生前尚未发表的专著《赵州大石桥史料类考》。

从这些论著中可以看出：孙贯文先生的学识极其广博，研究的内容遍及青铜器铭文、古代玺印、石刻等方面，涉及历史时期自商周直至明清。对于所考证的古代器物、历史事实、文化典故、宗教思想等众多问题，都能广泛引用有关史料与文物资料，细分析，深入腠理，并且在这些论文中反映出他独到的历史考据方式，体现出在古代铭刻研究中所总结的各种铭刻资料释读规律。尤其是对于古代文献与石刻资料的运用，极其严谨规范。在《赵州大石桥史料类考》中，孙先生对所征引的每一种古籍，都做了版本的比较与说明。这不仅是深厚版本知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比勘，指出文字上的变异与正讹，使所引用的文献史料真实可靠。同时，更将有关的历代金石著录、有关考古发现情况与历代拓本情况等一一加以说明，使研究该问题的史料实证荟萃于此，而无需他求，所要阐述的新观点也就顺理成章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论据充足是研究立论的根本，这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去做艰苦繁琐的资料研究工作，在没有电脑技术，全凭个人阅读与记忆进行学术研究的时代，这种考证功底表现出孙先生超人的记忆力与深厚的学术功力，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随着新技术时代的来临，这种严谨深入、巨细无遗的考证方法在如今学界已经十分罕见。代之兴起的是夸夸其谈、随意解释资料，杜撰一些所谓理论，追逐大而空的无用课题的风气。实际上这是只图便利、不求其解、哗众取宠的学风甚嚣尘上的结果。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学术的堕落。孙先生的著作，体现出老一辈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正像一面明镜，映照出当前学术之弊病所在。

谨以此书纪念尊敬的导师孙贯文先生。

（据微信公众号“三晋好书”）

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

——“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

□李裕群、Lidu Yi

【摘要】大佛山摩崖造像位于山西省高平市张壁村西北大佛山山腰间一处依山而建的古代佛寺的大殿遗址中。造像所在巨石顶部距现地面4.8米，正面（南面）为北魏龛像，背面（北面）为明代龛像。其正面龛像为当地张姓家族组成的民间邑社组织出资开凿，年代约当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前期（477-489年）。正面龛像的造像样式和题材明显承袭了北魏平城时期云冈石窟的特点，对于研究云冈工匠的南迁有重要价值。

大佛山摩崖造像位于山西省高平市米山镇张壁村西北大佛山山腰。地理位置为北纬 35°49′28.8″，东经 113°02′46.69″，海拔 1045 米。这处摩崖在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其造像样式和题材都表现出鲜明的北魏平城时期云冈石窟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鉴于此，我们于 2011 年 11 月和 2012 年 7 月两次前往实地考察，发现摩崖造像所在之处为一座古代佛寺遗址。寺院依山而建，大体坐北朝南。寺院南部现存用条石垒砌的两层台基高度 5 米有余，但不见可供登临的台阶。寺院周围有石砌围墙环绕。在寺院中心略靠北的位置耸立着一块片状巨石，其南北两面均雕刻龛像。此处地势较院内南部高出约 1 米，且在巨石南面约 3 米处发现条石垒砌的台基遗迹。据此这里应是寺内大



图一 石窟所在崖壁立面图、平面图

殿遗址，摩崖造像即为殿内所供奉。其他区域为树林和灌木所掩盖。据现场观察，遗址内有近年来被不法人员盗挖而形成的土坑，周围散布的瓦砾和残石雕刻大都属于明清时期的遗物，故可推测大殿遗址约为明代所建。

考察期间，我们走访张壁村村民，了解到在20世纪90年代，摩崖正面下龛内佛首和西侧菩萨头被盗凿，现下落不明。但从村民手中觅得造像被盗前照片两张，展现了造像的原貌。下面就大佛山摩崖造像的雕造年代、造像题材及其所反映的云冈模式南传等问题略作研讨。

背面摩崖为明代雕造的一组龛像，学术价值较小，此不赘述。下面主要讨论正面造像的相关问题。

1. 造像样式与雕造年代

正面造像龛西侧疑似发愿文的文字已无法辨识，也无相关历史文献和方志的记载可供参考，但造像所显示的时代特征十分显著。

首先，从造像样式看，佛和菩萨像均面相丰润，身体硕壮。佛像双肩宽厚，腰部稍细，身着袒右式袈裟，衣纹厚重，衣褶突起，其特点与云冈第二期稍早阶段造像一致。尤其是佛像直接坐在龛底，不施佛座的做法也与云冈第二期稍早阶段洞窟一致。又如菩萨像头戴高冠，冠上正面和左右各有一圆璧形装饰，戴穗状耳铛，披巾在肩上竖起，身披圆环形或X形的璎珞，这些也是云冈第二期稍早阶段菩萨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交脚弥勒菩萨的双蛇形胸饰，主要流行于云冈第一期和第二期稍早阶段。 云冈诸窟胁侍菩萨像一般没有这样的装饰，这一点二者也是相同的。因此，大佛山造像明显具有云冈第二期稍早阶段造像的特征，其雕造年代也应相差不远。

其次，从造像题材分析，大佛山摩崖为上下龛组合：下龛为圆拱龛，内雕释迦；上龛为楣拱龛，内雕弥勒菩萨及二半跏思惟菩萨。释迦与弥勒的组合形式以及半跏思惟菩萨作为弥勒菩萨的胁侍，均是云冈第7、8窟与第9、10窟所流行的题材。虽然大佛山楣拱龛的龛楣已经风化不清，但龛内雕弥勒菩萨像则是云冈第二期洞窟常见的表现形式，象征着弥勒菩萨所在的兜率天宫。另外，下龛两侧一对婆罗门像特别引人注目。其中有手捧骷髅头者，此题材在云冈第9窟和第12窟就有实例，但不见于龙门、巩县石窟北魏洞窟中。因此，大佛山摩崖的造像题材与云冈第二期稍早阶段洞窟的题材基本一致，表明雕造年代也大体相当。再从供养人服饰看，头戴圆顶垂裙高帽，身着交领窄袖长袍，下身着裤，此为常见的鲜卑胡服。北魏孝文帝推行服制改革始于太和十年（486年），至十八年（494年）全面禁止鲜卑服。据此，世俗供养人所着鲜卑服饰当是服制改革前的着装样式，其年代可能接近甚至早于太和十年（486年）。我们推断摩崖造像龛的雕造年代约相当于云冈第7、8窟和第9、10窟，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前期（477~489年）。

2. 构图形式与造像题材

整个壁面的龛像是统一设计和雕造的。下龛圆拱龛内雕释迦坐佛，上龛楣拱龛内雕交脚弥勒菩萨与二半跏思惟菩萨像。两龛之间为七佛小龛。下龛两侧上部为四佛

小龛；下部各有一婆罗门像龛。下龛之下雕成排的世俗供养人礼佛行列。

正如前述，上下龛有着内在的联系，构成上下的题材组合，即释迦与弥勒菩萨。这与云冈第二期洞窟正壁主尊龛像的构成一致。弥勒像应为弥勒在兜率天宫敷演说法、为众生释疑之像。这是十六国北凉和北魏时期流行的主要题材之一；二半跏思惟像应为太子冥思悟道的形象，即太子思惟像，在云冈往往作为弥勒菩萨的胁侍出现，两侧原为半跏思惟菩萨。显然现在世的释迦和未来世的弥勒作为主尊是礼拜供养的中心。两龛之间小龛表现过去七佛，与主尊相配合，组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佛。下龛两侧上部四佛小龛中东侧下龛为释迦苦修像。四佛图像的构成不易解读。释迦苦修像的出现似在告诫广大信众，苦行只能摧残身体，不能求得正道。下龛两侧下部二婆罗门像，东侧婆罗门手捧骷髅头；西侧婆罗门上身残，手持物不明。 成对出现的婆罗门像始见于云冈第二期洞窟，其中婆罗门像与大佛山造像十分相似，均头束高髻，须髯下垂，瘦骨嶙峋，袒露上身，着短裤，惟云冈婆罗门主要是半跏坐于束帛座上。此题材不见于龙门、巩县石窟，但在敦煌莫高窟较为流行。据此，大佛山下龛西侧所毁者应为持鸟之婆罗门像。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认为：云冈第 9 窟手持骷髅者当为昙曜所译《付法藏因缘传》卷六所讲的卖骷髅仙人因缘故事，但对持鸟者并没有作出解释。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手持骷髅者为鹿头梵志，手持鸟者为婆薮仙人。不管何种解释，二婆罗门像表现的是外道皈依佛法的因缘故事。

总之，大佛山摩崖造像的图像构成，旨在宣扬佛法传承有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皆有佛陀治世，且威力无穷，能使外道皈依。同时，修行佛法无需苦行。

3. 云冈模式与工匠的南下

大佛山摩崖造像龛的男性功德主均为张姓，有“唯那”和“邑子”的不同身份，并无任何官职；可以辨认的女性供养人有郭、王等姓氏，身份也有“唯那”和“邑子”。从男女供养人对称布局的排列方式，可以确认她们应该是张姓家族的妻女眷属。因此，这些供养人属于当地张姓家族组成的民间邑社组织，由他们共同出资开凿了这一组大型摩崖龛像。

大佛山摩崖造像与云冈第二期偏早阶段的洞窟造像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题材布局，还是造像样式都如出一辙。这是高平地区首次发现与云冈如此类同的摩崖造像。从表面上看，云冈模式南下影响到了高平地区是毫无疑问的，但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工匠的身份或来源问题。

在高平地区还有北魏孝文帝太和后期开凿的石窟造像，如高平羊头山石窟的大型释迦多宝龛和高平建宁乡北魏太和二十年（496 年）“邑子等为皇帝陛下造石像”四面造像碑。这些佛像和菩萨像虽然保留了云冈第一、二期造像的旧样式，但与大佛山摩崖造像相比差异显著，如佛像袒右式的袈裟一般不施衣纹，也无 Z 形袈裟衣边。佛和菩萨的形体略显丰满，但脸庞明显偏瘦长，肌体也不如大佛山造像那样丰满圆润，而且雕刻手法和技艺显得十分稚拙。这种差异性似乎暗示着两者出自不同的工匠之手。后者显然属于当地民间工匠所为，而前者则是非常熟悉云冈石窟造像



图二 局部供养人像

样式和题材的工匠所为。由此，我们认为雕造大佛山摩崖龛像的工匠极有可能来自于平城，并且曾经参与过云冈石窟的开凿。

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 年），是在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集聚了各地大量财富、人力和百工技巧的背景下，由沙门统昙曜主持雕造的。 云冈石窟是在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被学术界称为“云冈模式”。云冈大规模的雕造活动，从设计到施工，必然有严密的组织管理机构和工匠集团来实施。可以想见，通过 20 余年的开凿，应该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雕刻工匠，积累了丰富的佛教图像资料。一般认为，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 年）南迁洛阳后，云冈规模宏大的皇家洞窟开凿活动就此中止，随着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可以推测有相当数量的工匠南迁到洛阳。但从大佛山摩崖造像来看，这种情况可能在迁都前就已开始，尽管那时工匠南迁或属个别现象，却对当地石窟寺的开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平市位于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北邻长治，南接晋城，居上党盆地的中心位置。在北朝时期，高平是晋东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是连接平城和洛阳重要的交通纽带。建州所辖高都（今晋城）、长平（今高平）、安平（包括今沁水、阳城）、泰宁四郡（包括今沁心、阳城），范围并不大，但人口密集。三座城均在古代交通干线上。大佛山摩崖造像是建州境内开凿年代最早的，由此带动了当地开窟造像活动的兴盛。北朝石窟主要集中在高平市境内，比较重要的有北魏时期开凿的羊头山石窟、石堂会石窟、七佛山石窟，东魏开凿的高庙山石窟等。因此，云冈工匠的迁移及其对当地开窟造像的影响，是研究北魏石窟造像时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

（节选自《文物》2015 年第 3 期）

北魏金铜佛板图像所反映犍陀罗文化因素的东传

□李静杰

【摘要】已发现的北魏中期金铜佛板，虽然数量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早期佛教物质文化的发展面貌。佛板主要因素来自于犍陀罗浮雕大神变图像，细部表现更多地吸收了此前传入汉地的犍陀罗和西域文化因素，经过整合设计形成的新型图像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金铜佛板浓缩了众多佛教文化因素，便于持有者随时随地礼拜和祈愿，系汉地产生的创造性的佛教造像形式。

【关键词】北魏；金铜佛板图像；犍陀罗文化；大神变图像。

南北朝时期的金铜佛像有一种特殊的形制——金铜佛板，其主体部分为方板上的浮雕图像，不同于一般化附舟形光背金铜佛像，佛像的形体结构和造像内容均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蕴含着特定文化信息。

迄今所知金铜佛板实例，主要制作于北魏中期（439-493）。已发现的金铜佛板数量有限，多分散地收藏于海外博物馆，研究者难以全面调查并收集相关资料，因而长期以来没有能够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甚至被人们遗忘。事实上，北魏金铜佛板图像与西北印度犍陀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犍陀罗文化因素在北魏经过重新整合并吸收汉文化因素，形成了金铜佛板这种中外文化的混合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早期佛教物质文化的发展面貌。

已知保存比较完整的北魏金铜佛板凡有 5 件，其中 4 件青铜鎏金，1 件青铜，均采用模范铸造而成。佛板主体部分正面浮雕图像，背面或刊刻铭文，或线刻图像，或素面。



图一 北魏和平元年 (460) 比丘法亮造金铜佛板

根据支座有无和形制差异可以分为三种，即力士托举式支座佛板、一茎二枝莲花式支座佛板、无支座佛板。

其一，力士托举式支座佛板。1件，即北魏和平元年（460）比丘法亮造金铜佛板。由铭文可知，此佛板施主为比丘法亮，佛板主尊为弥勒佛，施主希望藉此造像功德，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其二，一茎二枝莲花式支座佛板。2件，分别为日本藏北魏金铜佛板、北魏延兴四年（474）青铜佛板。前者莲茎与莲枝粗细比例比较合理，视觉效果协调，似乎更接近原始形态；后者莲茎过于粗壮，与纤细的莲枝搭配不成比例，这显然是为加强支座的稳定性而为，应为前者的发展形式。由此而言，前者制作年代可能早于后者。

其三，无支座佛板。2件，分别为西安莲湖区出土北魏太和七年（483）追远寺众僧等造金铜佛板、日本藏北魏太和七年（483）追远寺众僧等造金铜佛板。前者可释读铭文与后者刻铭比较，仅有一字之差，其余文字全然相同，书体也没有两样，应为同一书手依据相同文字样本刻写所成。两者第四、五行字数有别的情况说明，二佛板铭文为铸造铜液趋于凝固时，由书手分别刻写所为，而不是预先在模具上写好文字。两者各自称呼所造佛板为“千像”、“千佛”的现象引人注目，从佛板表现一佛二菩萨的情形分析，并非佛板内容为千佛，而应是造千件同样的金铜佛板，也不排除此“千”字泛指佛板数量众多的可能。此二佛板施主为追远寺众僧、颍川公孙小等，未提及主尊尊格，施主希望藉此造像功德，使国祚永隆，群生普济。

上述5件佛板，近方形主体部分边长在10.8至13.4厘米之间，高或略长于宽，或反之，但大体维系在边长12厘米上下，说明这些佛板原初有共同的范本可依。然而，5件佛板的主体部分尺寸互有差别，表明粉本在传承过程中，用于铸造的模范相继更新，新本遂逐渐偏离了母本模范的尺寸。就已发现的北魏金铜佛板的形制和纪年铭文观察，三种佛板中力士托举式支座佛板、一茎二枝莲花式支座佛板应为原始形态，无支座式佛板为简化发展形态。日本藏北魏金铜佛板，为5件之中唯一采用镂空方式铸造的实例，目的在于制造立体效果，其余佛板可能为了利用背面刊刻文字或刻画图像，抑或简化模范的需要，于是放弃镂空技术。据两件无支座式佛板铭文透露的信息，进入北魏太和年间，金铜佛板作为施主累积功德的手段，曾经批量制作，尽管迄今所知实例数量有限，但将来可能还会有所发现。

北魏金铜佛板的显著特点在于其与众不同的图像构成模式，亦即在主尊佛上方



图二 日本藏北魏金铜佛板

表现二飞天托举宝盖，以及在佛板下方附设一茎二枝莲花式支座或力士托举式支座。这些构图形式不见于此前汉文化地区佛教遗存，其独特特设计和供养方式，似乎不是在汉文化土壤中自发产生的因素，应该另有所源。

在主尊佛上方表现二飞天托举宝盖，代表着一种全新设计理念和供养方式，不仅在此前汉文化地区，狭义西域（今新疆）也没有这种表现。将眼光投射更远些，在西北印度（今巴基斯坦）犍陀罗雕刻中，名为大神变的浮雕图像已经出现类似表现。在主尊佛像上方用接近透雕形式，表现二裸体有翼童子形天人，二天人相向飞来，双手捧持花盖，花盖前方装饰一枚花朵。所不同者，犍陀罗浮雕为有翼裸体天人双手捧持用花鬘编缀的花盖，而北魏金铜佛板则是飞天单手托举有布幔的宝盖，显然，自然风情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了这些变化的出现。

一茎二枝莲花式与力士托举式支座，迥然有别于从前金铜佛像那种四足床趺式支座，所以出现这样的支座形式，应有其特定粉本和教义来源。原型应为犍陀罗大神变浮雕的莲花支座，佛板两上方的禅定坐佛，则相当于大神变浮雕两外侧上方的化佛。如果连同二飞天托举宝盖因素一并考虑，可以不加含糊地认为，此金铜佛板图像即是犍陀罗大神变图像在汉文化地区的发展形态，之所以采用镂空 方式来表现，那是有意模仿大神变浮雕所为。

就已知实例观察，金铜佛板自北魏中期有规模地制作后，北魏晚期（494-534）至北朝结束近一个世纪鲜有新实例出现，进入隋代再度被批量化制作。已知 4 件隋代金铜佛板，均为无支座形式，形体近方形，各实例尺寸没有多少差异，边长约 15.4 厘米。这些佛板一概青铜鎏金，模范铸造。佛板四角、主尊头光两侧和台座两侧均有近乎对称的穿钉孔。穿钉孔的存在表明，佛板原初可能固定在小佛龛中。就诸佛板尺寸和穿钉孔位置，以及下述图像情况来看，它们应该由来于同样粉本，尽管没有铭文记述，但已发现的 4 件足以说明当初也是被批量制作的。隋代金铜佛板的形体与北魏无支座佛板一致，前者边长相较后者约增加 3 厘米。在制作过程中应参考了同种北魏金铜佛板。

诸佛板图像几乎相同。主要内容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五尊像。主尊佛结跏趺坐束腰仰覆莲圆形台座上，着右肩半披式袈裟，两手施无畏、与愿印。主尊两内侧胁侍二菩萨伫立在长茎莲蓬上，上身袒裸，下身着裙，帔帛挎肩后两端绕过同侧臂肘顺体侧垂下，戴项饰，挂缨络。左侧菩萨左手垂下握帔帛，右手举白拂；右侧菩萨左手举经卷，右手施无畏印。主尊两外侧二弟子伫立在莲蓬上，着裹身垂领式袈裟，两臂袖于袈裟之内，右手略微伸出提摩尼宝珠。佛板上方两侧配置一对飞天相向飞来，各以内侧手托供养物。在主尊台座两下方，各一菩萨盘腿坐在仰覆莲台座上，以内侧手托摩尼宝珠供养。一佛、二菩萨附设桃形头光，二弟子、二供养菩萨附设椭圆形头光。诸人物之间填充流云、花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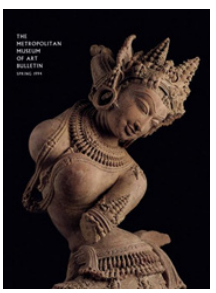
入唐以后，北朝、隋代这种无支座佛板继续制作，同时出现设置庑殿顶或歇山顶的殿堂式佛板，加强了佛板的庄严性，唐代殿堂式佛板又影响了宋元明清时期佛

板制作，成为特别适合于个人或家庭供养的佛像形式。

金铜佛板属于特殊的金铜佛像，系汉地产生的具有创造性的佛教造像形式，浓缩了诸多佛教图像因素。金铜佛板便于随身携带，有如一座能够移动的小型佛堂，可以随时随地礼拜供养，满足持有者祈愿和还愿的心理需求。

（节选自《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5期）

书刊推荐



The Arts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南亚和东南亚的艺术》）

作者：大都会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出版时间：1994

简介：

宗教的共同遗产显然主导着南亚和东南亚艺术。三种早期的宗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启发是该地区进行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印度教是古代信仰体系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名称。其先例的第一个明显证据出现在印度原始历史文明的文物中，通常被称为哈拉潘或印度河谷：高度发达的城市文化，成就斐然，并在公元前2500年至1700年间蓬勃发展。尚不可能清楚地了解那些神秘人士的宗教传统；然而，在这一时期，现存的稀有人物形象很可能是神的先驱或原始形式，后来成为印度宗教实践的基础。

印裔雅利安移民构成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学作品，他们在公元前二千年从北方降落到印度次大陆。最古老的是吠陀经，这是四本赞美诗的集合（最早的部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是印度教的基本经文。婆罗门纳斯和Aranyakas（约公元前1000−500年）继续吠陀经的礼仪问题，而奥义书（约公元前700−500年）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辨。这种文学丰富性并没有反映在那个时期的宗教文物的微薄语料库中。

公元前一千年中期后来的印度教崇拜的许多基本要素都到位了，其中包括从韦达万神殿继承而来的一些神灵以及其中的自然神灵，对原始女神生育力图像的早期崇拜的遗迹。对当地的习俗和宇宙神灵的虚无主义崇拜。革新哲学体系，包括对因果的信仰，因果关系的宇宙定律；和灵魂的轮回（轮回）。通过重新融入绝对的，非个人的无限的尝试，从连续的出生，死亡，迁徙的循环中寻找释放，所有的一切。

南涅水石刻参观札记

□杭侃

【摘要】山西沁县南涅水位于208国道旁。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石刻窖藏，出土了1100多件从北魏到北宋的造像单体，多数石刻层垒起塔的独特组合方式，与当地的石材材质有关。对于北宋时期的这种瘗藏行为，本文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宋代佛教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造像的题材和艺术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而对前朝的佛像采取了集中于一座主要寺院进行瘗藏的处理方式。

【关键词】南涅水；石刻；瘗藏；造像风格；北宋。

2019 年的 7 月和 8 月，我先后两次参观山西沁县出土的南涅水石刻。1959 年沁县洪教院后面台地上出土的南涅水石刻群，与 1953 年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石刻群、1954 年四川成都万佛寺出土的石刻群，是 20 世纪 50 年代出土的三批著名石刻。

南涅水石刻出土地现有 2013 年所立的南涅水石刻造像出土遗址碑，碑文对该村所属的涅县的历史沿革、在佛教传播中的作用、南涅水石刻的发现和保护现状作了说明。

南涅水造像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延续时间长，以单层、分体、多级石塔的构件为主。不过，“目前的南涅水石刻陈列，虽说石塔林立，颇为壮观，但仔细观察，总感觉摆置的形制内容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虽然如此，但这些已经做好陈列和保存于库房中的石刻搬运难度大，且考古发掘报告尚未出版，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分石刻的出土与收藏、石刻的形制与材料、瘗藏的时间与原因三个子题，成此札记，以就教于方家。

一、石刻的出土与收藏

《文物》1959 年第 3 期上发表了郭勇的文章，文中简要地介绍了南涅水石刻的出土情况，将石刻分为石塔造像、单身造像、造像碑、文字碑四大类，并指出：

“石塔造像：约五十余座，均为五石迭成，作方柱形，由下而上逐渐收小，通高 4 米左右，每节均为四面造象，都是北朝时期的作品。

“单身造象：约有二百尊左右，残毁较严重，最大的 3 米，最小的 30 厘米，有佛、菩萨、罗汉、力士等，在一个佛座上

刻有:‘自神龟元年到正光二年造像十八尊’的铭记，是记年铭记中最早的一件。

“造像碑：数量较少，碑身上多有北朝纪年。如‘大代建议元年’、‘大代建议二年’、‘大代正光二年’三碑，都是四面造象，龛内胁侍菩萨有站在狮子背上的，以往很少见到。东魏武定四年及北齐天保六年、北齐武平六年三碑，都是很多人合伙造的。此外还有满雕小象的千佛碑。

“文字碑只有三块：北魏神龟元年碑……唐咸通九年碑……宋天圣四年碑。”

属于南涅水造像系统的造像数目当不止于上述的数字。笔者参观武乡大云院的时候，就看到被保护人员收藏起来的数块方形四面造像，其与南涅水造像同属一个系统（图一，2）。笔者在调查武乡韩登村太清观的时候，村民拿出一块四面造像，据说是从当地的山沟里收集来的（图一，3）。以上诸例，可以说明在古代沁县、武乡一带，分布着一定数量的相同类型的造像。

1996 年，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石刻造像。李森认为山东青州龙兴寺发现的石刻，是将周围不同地点的石刻集中到龙兴寺加以瘗藏的。



图一

1.阳公岭村六级石塔… 2.大云院藏单体石刻造像 3.韩登村太清观藏单体石刻造像

1953 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了 2200 余件汉白玉佛教造像，其中的纪年造像时代上起北魏神龟三年（520 年），下至唐代天宝九载（750 年）。冯贺军通过研究其中的发愿文题记，指出涉及的寺院名称共 8 处，这批造像最初应与这些寺院有密切联系。结合笔者调查的散见南涅水系统的石刻来看，20 世纪洪教院后台地出土的窖藏石刻，应该也是集中了附近一些寺院的石刻加以瘗藏的。

二、石刻的形制与材料

南涅水石刻的形制特殊，其中的塔形石刻从发愿文看有“图塔”“高举”“石级造像”等不同名称，均由大小不同的单层四面石刻层垒而成，其上加以塔刹，构成独特的塔形。其与同时期的一些石塔形制明显不同，南涅水造像石塔采用的是单层分体组合的形式。那么，南涅水石刻为什么会采用如此独特的形制呢？笔者以为这和当地石材的材质有关。

据文物普查的资料，山西境内除了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外，还有三百多处中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主要分布于晋中和晋东南地区，其中较具代表性者为武乡良侯店石窟。

良侯店石窟具备明显的早期特征。笔者认为它开凿于云冈二期，带有官式造像的特点，是北魏王朝南迁背景下开凿的石窟。但是工程没有完工，后来补刻的菩萨像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与主尊并非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座石窟开凿的岩体有多



1　　2

图二

1. 良侯店石窟所在岩体的纵向裂隙　2. 良侯店石窟外的纵向岩体及小龛

处纵向裂隙（图二，1），主要造像似乎又都避开了窟内的裂隙。同时，石窟外的纵向岩体上有的有后来补刻的小龛，其大小正好与纵向岩体相对应（图二，2）。由此可得出如下推论：

1. 北魏王朝在南迁过程中，沿途并非不想开凿石窟，但没有适合开凿大型窟龛的山体。故留存下来的都是一些中小型石窟和摩崖，当然也有在此背景下开凿的民间石窟；

2. 沁县、武乡一带的山体纵向裂隙较多。南涅水系统的石塔采用单层、分体、组合的形制，是根据附近石材的特点因地制宜所采取的形式。

单体分层组合式的四面造像石塔并非南涅水附近所独有。1974 年在甘肃庄浪县良邑乡李家咀村宝泉寺出土（另一说为 1976 年庄浪县水洛城徐家碾出土）了 1 座五级造像石塔，与南涅水系统的石刻结构形式相同。前些年在庄浪宝泉寺遗址又有佛本生故事碑、双面佛坐像碑、菩萨飞天造像碑等石质文物出土，有的有铭文，材质和类型与卜氏五级造像碑类似，同属北魏时期。

山西沁县和甘肃庄浪两地这种造像塔之间的联系还有待更多的资料才可加以进一步研究。北魏内地与边地之间保持有频繁的互动，这是当时民族融合方面值得注意的话题，有待将来进一步的讨论。

三、瘗藏的时间与原因

崔峰曾撰文在统计了 20 处重要佛像出土事件之后，认为这些佛像出土事件有着共同特点：

1. 从出土情况看，都是集中出土，造像被集中掩埋。形式上有的是坑窖式，有的在塔基下，有的塔下建有地宫。出土地点都处在历史上某一寺院遗址内或附近地区。

2. 出土造像皆遭人工破损，无一完整，有的残损相当严重。造像残件埋藏时摆放整齐，有规律。许多现场遭到破坏的，可能显得零乱。出土造像较多的窖藏中，还

将残像分类、分层摆放。不少伴有建筑构件、铜钱、陶盆等物品出土。

3. 出土造像中不少带有纪年铭文，北方地区较早者在北魏，较晚者为晚唐和宋初。四川较早的是刘宋元嘉二年（425 年），晚者在会昌灭佛后的大中元年（847 年）。其中多数造像为北齐、北周和唐代的作品。几个出土规模较大者的年代跨度达几百年以上。崔峰认为这些瘗藏佛像的形为不是“三武一宗”毁佛时所为。杨泓认为，北宋时期青州地区的寺院应该盛行着一种隆重的法会，寺院的僧人将早年在各种灭法活动中损坏的佛像或者经年累月破旧的佛像集中起来，然后举行隆重的仪式，将它们埋藏起来，以积累功德。

类似的石刻窖藏近年来还不断有所发现，在大殿下发现佛教造像窖藏的也并非孤例。如果我们扩大视野，则这种将“舍利埋葬的内涵扩大化”的案例更多。

麦积山 127 窟是北魏时的洞窟，北宋时期在洞窟的中间位置塑造了一佛二菩萨造像。20 世纪 80 年代，工作人员在主佛头部的残破孔洞处看见内有小型的塑像，后利用孔洞将两身北魏小型供养人塑像取出，二者保存完好。同时发现许多件这样大小的头像，可见这些小型塑像是脱落后或者从其他洞窟内收集并藏于此佛像内的，以“装藏”的形式存在。

类似麦积山石窟宋代塑像这样的“装藏”行为，在河南巩县石窟中也曾经发现过。结合沙畹早年的照片和相关学者的文字描述，我们知道北宋时在巩县石窟的一些北魏造像的外面泥塑了新的佛像。在维修过程中剥去宋代新塑的佛像之后，看到的北魏石刻佛像基本上是完整的。也就是说，北宋泥塑佛像的行为并不是由于北魏的造像遭到了破坏之后的补救行为。怎么解释北宋时期这一行为呢？笔者以为，这大概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北宋佛教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艺术的审美形式发生了变化。在这二者的影响下，造像的材质和艺术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的艺术风格不再受到尊崇是可以理解的。

百余年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是学者们致力探讨的一个重点，其中，敦煌研究院的张先堂在考察中国古代各地曾经普遍出现的“经像瘗埋”现象的基础上，认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藏经的来源、结构及其封闭都与佛教法供养活动密切相关。

笔者同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封闭的圣物是法供养，并赞同将藏经洞与北宋窖藏佛像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加以考虑，认为它们均是法供养的产物。但是，为什么会将前朝的旧物收集在一起，通过一定的法事活动加以瘗藏呢？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北宋时期佛教的内涵和造型艺术的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其说埋藏的是过去的圣物，不如说告别的是旧的时代。

（节选自《华夏考古》2020 年第 6 期）

昙曜五窟的营造次序和理念

□韦正

【摘要】昙曜五窟的营造分第20窟、第19-16窟前后两个阶段；五窟从西向东依次排列，分别对应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太子、文成帝；具体的营造次序为第20-17-19-18-16窟。这一营造次序既遵循也反映了昙曜五窟的营造理念，其核心内容是以西为上。

【关键词】昙曜五窟；营造次序；营造理念。

由于在昙曜五窟开凿之前，文成帝有在平城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金像一事，学界皆认为昙曜奏请文成帝开五窟，乃铸五帝金像一事的翻版。因此，昙曜五窟具体为哪位北魏皇帝所开，即昙曜五窟的皇帝比定是一个真实问题。如何比定与昙曜五窟的营造理念和营造次序有关联。营造理念方面，以往诸家之中，以昭穆说颇具统摄性，并在营造方面提出第16窟本居第20窟之西（即今第21窟所在位置），后鉴于第20窟前檐崩落，而迁于今第16窟所在位置的推测。本文以为，昙曜五窟工程浩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有一定的营造次序，这在五窟今存崖壁表面也有迹象可寻。五窟营造上的孰先孰后与所比定皇帝地位的轻重有关。本文就此推测昙曜五窟的营造次序可分为第20窟、第19—16窟前后两个阶段；五窟从西向东依次排列，分别对应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太子、文成帝；具体的营造次序为第20—17—19—18—16窟。这样的营造次序既遵循也反映了昙曜五窟的营造理念，其核心内容是以西为上。下文先论营造次序，次论营造理念。

一、营造次序

本文所拟议的第20—17—19—18—16窟的营造次序，可从五个方面予以说明：

1. 第20窟和第17窟可能是开凿年代最早的洞窟。第20窟三佛与第17窟左侧佛尊（以面向窟门为准，下同）袈裟的衣纹都是凸起的条带，上有刻划线，且泥条头部尖细（图1），具有很强的塑像效果。这种条带装饰是对犍陀罗雕像的模仿与改造。在云冈和中国内地其他地区的石窟和造像中，以这种泥条装饰的不多，且年代也都较早。昙曜五窟中，只有第20窟和

第 17 窟以这种方式装饰。因此，第 20 窟与第 17 窟同是最早开凿的洞窟。但二者相比，第 20 窟佛尊袈裟的泥条更圆鼓，第 17 窟的相对扁平（参见图 1），所以第 20 窟的装饰面貌相对原始，年代可能也更早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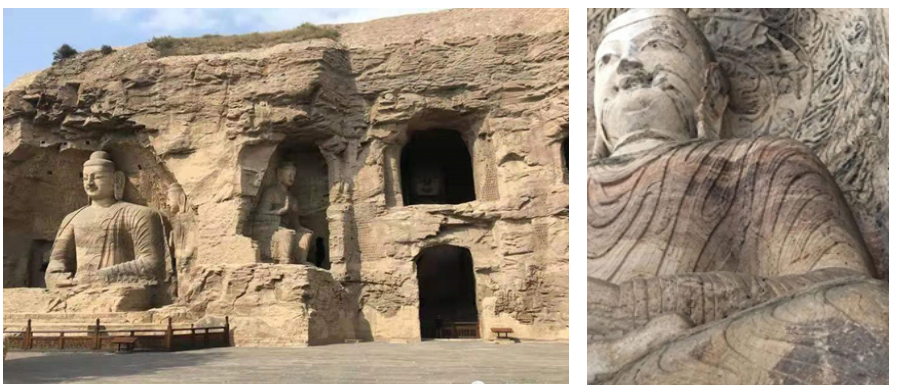


图 1 第 20 窟与第 17 窟东侧佛陀袈裟衣纹
（左）云冈石窟第 20 窟主尊及与第 19 窟关系；（右）云冈第 17 窟东侧佛尊

2. 第 20 窟和第 17 窟都是开凿有明显失误的洞窟，暗示二窟开凿年代可能较早。第 20 窟开凿的明显失误表现在前檐塌落，并伤及右侧立佛。引起失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云冈岩性了解不足，没有将山体表面脆弱部分清除后再行开凿，致使前檐很快崩落，而且造成第 20 窟位置比其他四窟靠前，今日看来第 20 窟显得较浅也职是之故。第 20 窟地面明显高于其他四窟，也可能是虑及了进一步下凿带来的安全隐患。将这种情况理解为石窟开凿早期的不成熟现象较为合适。第 17 窟开凿的失误体现在洞窟地面被迫下凿（图 2），此由第 17 窟主尊交脚弥勒比例控制不当。而同样以巨大的弥勒为主尊的第 13 窟就没有重蹈覆辙，这是第 17 窟较早开凿的证据。第 17 窟吸取了第 20 窟过于靠前的教训，但洞窟高度没掌握好，这是佛尊袈裟泥条装饰带之外，第 17 窟要晚于第 20 窟的又一证据。



图 2 第 17 窟内外高差

3. 第 20 窟和第 17 窟较早开凿有其合理性。道武帝为包括文成帝在内的五祖之首，理应最先为其造窟，时代最早的第 20 窟可因此拟定为道武帝之窟。景穆太子为文成帝之父，又有特殊的护法之功，也应优先为其造窟，时代次早的第 17 窟可因此拟定为景穆太子之窟。景穆太子与弥勒菩萨身份的相合，已为学界所公认。所谓昙曜五窟，并不意味着五窟同时、大规模的等速营造。可以设想，大概先确定了五窟的排位，并划分了五窟的大致位置，甚至有粗营窟门等外部形态之举。或许昙曜五窟本来都可能像第 20 窟一样靠前，但惩于第 20 窟之失误，其余四窟遂进一步向内斩山，但这不改变原来四窟的位置和次序，并且第 17 窟得到了优先加快开凿的机会。至于将道武帝安排在最西的位置上，事涉昙曜五窟的营造理念，即不仅由于其居五祖之首，可能还与拓跋鲜卑以西为上的习俗有关，详见下文。

4. 第 19 窟的营造要晚于第 20 窟，不仅有佛装方面的指征，还有营造方面的迹象。第 20 窟之外四窟基本位于一线，但第 19 窟主洞又明显后缩（图 3），这可以理解为鉴于第 20 窟窟檐崩落，所以需将紧邻第 20 窟的洞窟即第 19 窟多退后一段距离（参见图 1），现存第 19 窟西耳洞前部的崩落或可说明这种理解并非虚妄，因此，第 19 窟可能并无特殊地位，不过是鉴于之前第 20 窟窟檐之崩落，因而别作构造，从而显得更为宏大，但实际上并不特殊，且年代既晚于第 20 窟，也晚于第 17 窟。不过，上述迹象和用心也可见第 19 窟之大规模营造并不很晚，大概在第 20 窟、第 17 窟主体完成之后就展开了。

5. 第 21 窟附近完全看不出先开后弃的迹象。或以为第 16 窟选定于现今位置乃不得已而为之，暗示第 16 窟本应在今第 21 窟位置上，并认为在现今第 21 窟位置上找不到一期开凿的痕迹，其原因在于昙曜五窟开凿的时间略有早晚。上文已指出昙曜五窟为一体设计，有可能起初就划分了五窟大致位置，甚至有粗营窟门等举措。今第 16 窟虽然主尊有被改造并且年代较晚的特点，但第 16 窟之窟形和部分造像均说明云冈一期已开始营造（图 4）。如果第 16 窟本在第 21 窟位置上，其营造之年代当更早一些，即使后来放弃，也当或存在巨大的窟形，或存在不合比例的造像，或在壁面上留有明确的停工痕迹。但上述痕迹俱无，只能证明不存在曾拟在此开凿第 16 窟而又放弃的情况，只能说明未曾有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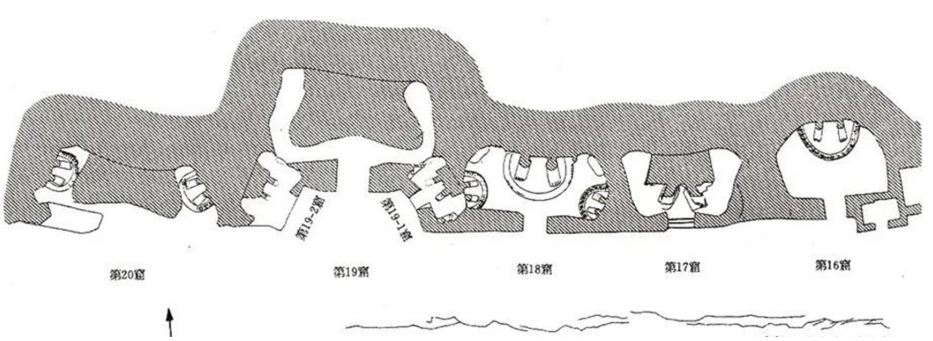


图 3　昙曜五窟平面图



图 4　第 16 窟窟顶和窟内造像局部
（左）第 16 窟窟顶；（右）第 16 窟东壁第 3 层圆拱龛左侧坐佛

今第 21 窟位置开凿第 16 窟的打算。

据上文分析，昙曜五窟似存在以第 20 窟为首，第 17 窟其次，再次第 19 窟，复次第 18 窟，最后为第 16 窟的营造次序。昙曜五窟的营造总体上分为两批，第一批是第 20 窟，第二批是第 19 窟到第 16 窟。第二批洞窟没有因为第 20 窟的失误而重新规划，只是作了调整，表现在第 19 窟到第 16 窟壁面的总体退后，第 19 窟主洞的进一步退后等现象，但依然出现了第 17 窟的失误。

二、营造理念

昭穆制是一种宗庙制度，昙曜五窟按照昭穆制开凿的意见富有启发性，但昭穆制是否可用于昙曜五窟，曾布川宽曾提出质疑：“虽说是为北魏历代皇帝而营造的石窟，可昭穆制的配置是否合适，还是有必要探讨的。另外，在宗庙的昭穆制配置上，以太祖为中心，牌位的确是左右交替排列下去的，但同时越是成为后代的皇帝，就越是降退到后方，像云冈石窟那样，横排成一列是否合适也是一个问题。”

上面的讨论还属于具体现象，那么，拟议营建昙曜五窟的和平初年（460），北魏是否已经实行昭穆制则是一个更需要证明的大前提。从文献记载看，在昙曜五窟开凿之前，北魏已实行七庙之制。但这个七庙之制不完全等于华夏传统昭穆之制的七庙之制，这是因为这个七庙之制由道武帝时期确立的五庙之制发展而来，道武帝天兴年间所立五庙为神元、平文、昭成、献明以及道武帝为自己预留之庙，这五位人物不能构成昭穆，所以五庙自然不能以昭穆制论。由于天子七庙最为经典之说，随着北魏政权华夏化进程的逐渐加深，北魏五庙制也逐渐向七庙制转变，但文成帝时七庙之制与昭穆之制还是有一定距离，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以平文帝为太祖。只要平文帝为太祖，道武帝以下诸帝就无法与之建立合理的昭穆关系。因此，即使文

成帝时在心理态势上已经准备实行昭穆制，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问题。以这种不完整的昭穆制，去推测昙曜五窟按照昭穆制而开，解释上的困难难以回避。

宗庙的昭穆之制证据不足，但拓跋鲜卑却长期存在以西为尊的习俗，明乎此，才能明白孝文帝后来正式实行汉式宗庙之祭前，汉式的昭穆制不可能完整存在和拥有崇高地位；也才能明白文成帝为自道武帝始的北魏建国后五帝铸像开窟，既无关拓跋鲜卑传说中的七位先祖，也无关宗庙之制，只是对北魏建国后所存在五帝的客观“叙述”，目的都是宣扬“皇帝即当今如来”，并依照鲜卑人物乃至北魏五帝的形象去塑造佛尊。包含祭祖内容在内的鲜卑祭天仪式既然以西为上，那么代表道武帝以下五帝的昙曜五窟以西为上，实属顺理成章。

总之，西向为尊的拓跋鲜卑民族文化特点和“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构成昙曜五窟从西向东顺序对应道武至文成北魏五帝的基础，具体的营造次序则是在基础上的斟酌调整。

（节选自《敦煌研究》2020 年第 6 期）

书刊推荐



《北朝造像题记书体研究》

作者：岳红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1

简介：

魏碑是北朝时期的书法风尚，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由“洛阳体”、“长安书体”、“平城书体”、“邺城书体”、“凉州书体”等地域书体组成，涵盖摩崖、石阙、造像题记、碑碣、墓志等刻石。本研究以造像题记书法为例，分析这五种书体在北朝不同时期的类型、风格特点及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发展、影响和融合过程，并多角度探究魏碑书法的组成体系及发展演变历程，以拓展“魏碑”书法的研究内容，促进学界对魏碑书法的全面认识，并为书法实践者提供更丰富的临摹对象。

日本云冈石窟研究著作目录（三）

论文题目	作者	期刊	出版单位	卷号	页码
「雲岡石窟」瞥見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55(4)/1986-09	146-155
「雲岡石窟」瞥見 -2-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56(5)/1986-06	197-208
「雲岡石窟」瞥見 -3-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56(8)/1985-05	328-341
雲岡と竜門と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55(6)/1985-07	231-243
雲岡と竜門と -2-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57(3)/1987-03	97-109
雲岡が提供する問題のいくつかについて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55(9)/1985-11	372-384
雲岡石窟保護の現状	岡田 健	文化財保護制度の研究	東京文化財研究	2001	
雲岡石窟寺の考古學研究	岡村 秀典 向井 佑介	日本東方學	中華書局	1/2007	23-38
岡田暁生［開所記念講演］雲岡石窟寺の考古学研究	岡村 秀典	人文		53/2006-06-30	1-66
雲岡石窟の出土品	岡村 秀典	人文		52/2005-06-30	1-74
雲岡石窟における大型窟の編年	岡村 秀典	國華	國華社	122-2/2016	
雲岡中期における佛教圖像の變容	岡村 秀典	東方學報（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91/2016	452-500
北魏平城期の雲岡石窟	岡村 秀典	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東アジア１後漢・三國・南北朝	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2017	

论文题目	作者	期刊	出版单位	卷号	页码
雲岡石窟の初期造像——曇曜五窟の佛龕を中心として——	岡村 秀典	東方學報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93/2018	281-328
大同雲岡石佛撮影記	小川 晴陽	清閑	清閑舎	9/1941	
雲岡石窟第6窟上層龕：如来立像の製作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東山健吾教授退任記念）	小澤 正人	美學美術史論集	成城大学	14/2002	157-192
雲岡石佛寺の今昔	太田 正雄	改造	改造社	24-9/1942	
雲岡の石窟	小野 勝年	京都帝國大學新聞	京都大学新聞社	268/1937	
雲岡だより	小野 勝年 日比野 丈夫	東洋史研究	東洋史研究会	6-1/1940	306
大同石佛寺の保存について	小野 勝年 日比野 丈夫	美術研究	帝國美術院附屬美術研究所	109/1941	1-14
雲岡の阿彌陀像について	小野 勝年	北支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	4-11/1942	34-38
雲岡石窟とその調査報告	小野 勝年	仏教芸術	仏教芸術学会	18/1953-04-10	30-47
十九年目の瞥見(雲岡石窟)	小野 勝年	世界美術全集月報	角川書店	1966	
雲岡第六洞とその佛傳	小野 勝年	國立博物館ニュース	東京美術	172/1961	
曇曜五窟と『法華経』	小山 満	創大アジア研究	創価大学	20/1999	22-35
供養天像の変遷からみた雲岡石窟の編年	片山 寛明	Miho Museum研究紀要	秀明文化財団	1/1997-03	9-68
二〇一七年九月山西省北部踏査記	柿沼 陽平 峰雪 幸人	史滴	稲田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室	39/2017	130-155